

西
LOOKING BACK
TO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城追忆

3
2018
总第69期

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打开德胜门外第二监狱
改革开放洪流中的西城区文物保护工作
老匾 老铺 老故事
菜市口的维新斗士
一座记录和见证历史变化的门

总第69期 2018年9月出版
准印证号

京内资准字2006-L0013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8号
邮政编码:100054
联系电话:(010)83976501
(010)83976494
E-mail:Xczy8806@126.com

编委会

主编:李茂福
副主编:李勇 金梅 汪杰
编辑:张小丽 符欣 江成
孟霞 庞晨

摄影:陈淑运
题字:爱新觉罗·溥任

封面:德胜门箭楼(1915年)
封底:今日德胜门

敬告各界读者

●本刊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作者来稿必须是著作权人或依法享有发表权的公民,如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并对由此给本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刊已纳入《北京西城往事》、北京西城档案信息网。凡《西城追忆》发表的文章在以上书籍、网站采用,不再重复支付稿费。如对此持有异议,来稿时请事先说明。

目录 Contents

兰台动态

- 01 郁治到区档案局(馆)调研
02 西城区人大代表视察区档案馆
03 西城区召开“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期监督评议工作会

红色记忆

- 04 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打开德胜门外第二监狱 刘生津
10 五星红旗是怎么印制出来的 阮珍珍

专稿——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 11 昔日人生观大讨论主角“潘晓”的人生走向 郭海霞
17 改革开放洪流中的西城区文物保护工作 高申

档案记忆西城

- 20 关于西城区无障碍改造工作的回忆 刘闯
22 老匾 老铺 老故事 高新贞

口述纪实

- 24 我所结识的三位西城人(二) 王宝升
27 深切怀念程志华同志 张奇生
29 回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点滴往事 程晓英

西城追忆

爱新觉罗溥任



P05



P40



P49

西城故事

31 菜市口的维新斗士

靳萧飒

34 天桥名伶张宝华

马铁汉 刘韶华

老城名片

36 崇元观旧址的三所大学

郑再帅

42 一座记录和见证历史变化的门

杨小燕

46 西城的里弄式住宅探寻（上）

白皓

档案信息

53 强化档案服务能力，切实将资政惠民落实处等15则信息



更多精彩内容请微信搜索
“西城档案”或扫描二维码

本刊如有印刷、装订问题，编辑部予以更换

郁治到区档案局（馆）调研时强调 依托档案工作展现西城历史文化内涵



郁治副区长（左二）与来馆查档者交流

8月15日，西城区主管副区长郁治到区档案局进行工作调研，在区档案局李茂福局长的陪同下，参观了“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以档为证 以史为鉴——西城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档案史料展”，并深入查档窗口及库房进行调研。听取了有关区档案局近年来的工作亮点和特色、亟须解决的问题以及明年工作设想的汇报，详细了解了档案行政执法、档案开放利用、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郁治副区长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档案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要求区档案局加大对档案工作的宣传力度，展现西城历史文化内涵，在深度挖掘、丰富内涵上面下功夫，让档案说话、用档案说话，变“死档案”为“活资源”；加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开展档案管理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从而提高全区档案管理水平；加强党建工作、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支部活动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立足岗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创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西城区人大代表视察区档案馆

8月8日，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礼斌带领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一行15人到西城区档案馆视察，就《档案法》实施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

代表们先后参观了“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以档为证 以史为鉴——西城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档案史料展”、查档窗口及档案库房，听取了区档案馆馆长李茂福就我区的档案事业发展情况的汇报。

张礼斌同志对区档案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区人大把《档案法》的落实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议题，一方面要推动《档案法》在西城的落地生根，另一方面要推动这项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西城区在依法治档、广泛收存、规范服务、精准防护、信息提速、新馆建设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要加强《档案法》的普及和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和意识；加大执法力度，重心下移，强化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监督指导服务；不断推进新馆建设，促进全区档案事业的全面发展。



西城区人大常委会一行15人听取我区档案事业发展情况的汇报



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在西城区档案馆参观了“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

西城区召开“十三五”时期 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期监督评议工作会

按照北京市档案局关于做好《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及《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西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期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西发改〔2018〕61号）要求，西城区档案局认真开展了“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

8月28日召开了“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期监督评议工作会，诚邀了24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立档单位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参加，听取了“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报告，与会人员就实施规划情况及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座谈。

刘燕萍代表提出档案要助力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加快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不断拓宽档案管理的覆盖面，提高档案人员的整体素质。辛迪代表提出要重视档案的收管用环节，加强档案基础建设，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考量，发挥档案的资政惠民的作用。卢子明委员提出不断拓宽档案宣传领域，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法制意识，确保档案信息安全。邱岩委员提出要把依法治档贯穿档案工作的全过程，提高档案利用管理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查档服务。

最后，李茂福局长对关心和支持档案工作的各位代表委员和主管领导表示由衷感谢，西城区档案局将认真梳理这些意见建议，将从档案法制宣传、专业档案的监管指导、古都文化保护、档案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新馆建设等方面继续努力，以便进一步推动规划实施，改进工作，从而提高全区档案管理水平，圆满实现“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

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打开德胜门外第二监狱

□ 刘生津

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全称河北省第二模范监狱，位于德外的新康路（现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1903年在功德林庙宇的基础上建成功德林看守所。1914年定名为京师第二监狱。1928年国民政府更名为河北第二监狱，占地近百亩，监房有16座359间，可容纳千人以上。它的设计非常独特，在监狱的中央是一个八角型的大厅，在大厅的上面是两层八角塔楼，哨兵站在塔楼上可以环视整个监狱，与八角型大厅相通的是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发散的八条甬道，每条甬道按《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编号，以后又改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个甬道尽头有八个角楼，每个角楼都与高高的围墙闭合成八卦的形状，这里昼夜有持枪的狱警站岗，每条甬道与甬道之间各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扇面小院，是供犯人放风的地方。在八个角楼大门正对的八个甬道里有一个铁栅隔离，从这里可以监视囚犯的动静，关在各监房内的犯人不论是从哪个甬道出入都必须由中央大厅通过，狱警站在大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甬道监房的情况。

北平第二监狱，与第一监狱、第三监狱不同，它之所以被称为“模范”就是因为里面有个绞刑机，是专门关押和处置我党政治犯的地方。1931年初-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省军委、青年团省委遭到三次大的破坏。其中，唐山市委、北平市委、天津市委、直中特委也受到破坏，到了1933年，中共河北省委又受到第四次破坏……

中共乐亭县委宣传部长，全国总工会北方代表处天津特派员李海涛被敌人关押在天津第三监狱，当叛徒指认他时，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说：“我就是共产党人，我就是要抗日，你们要杀就杀，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对他进行了残酷的酷刑，为了反对敌人的酷刑和虐待，李海涛和韩庄、韩培义等组织了狱中党支部，领导了绝食斗



北平第二监狱

争。在绝食期间，敌人对政治犯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吊打、灌稀饭、威胁，同时还采取了利诱、造谣、挑拨离间，但是“政治犯”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坚强不屈，一直坚持到第五天。李海涛撰写了《第三监狱政治犯绝食宣言》和《告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委托被争取过来的看守带给了媒体；天津《庸报》当日就刊登了《告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益世报》也迅速报道了政治犯绝食的消息。在《绝食宣言》中，他们痛批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降日、实行内战、镇压抗日运动的罪恶行径，揭露了监狱中的黑暗和反动派迫害爱国青年的罪行，强烈要求无罪释放政治犯，让他们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的惶恐，明令报上不许刊登《绝食宣言》，但是绝食斗争还是轰动了整个天津市，各报社纷纷派记者到狱中采访，各界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不断冲破阻挠来到监狱探望，敌人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答应改善监狱管理条件，但仍顽固地拒绝释放“政治犯”出狱。1936年12月敌人将他们押往张家口，李海涛又组织狱中党支部与敌人展开了“反外解”斗争，在押往天津火车站的路上，他们高喊口号举行示威，

当火车经过北平西直门火车站时，他们又进行卧轨斗争，敌人无奈之下只好将李海涛等关押到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

李海涛等一批重要“政治犯”一进监狱的大院，就看到树立在院子里的绞刑设备，监狱长对他们说：“这里可与第一监狱和第三监狱不一样，是随时可以杀人的地方，这台机器就是处死你们领袖李大钊的机器，墙外一层层的白骨就是坟场。”监狱长说完就把李海涛等关押到“章字号”和“洪字号”牢房，一同关押的还有五县农民暴动领导人郭芳，磁州暴动领导人马载、唐洛寿等。

北平地下党展开的两次救援行动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带领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到山西“扩红”，周恩来副主席组织“国民党上层工作委员会”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统战，刘少奇出任北方局书记，打通由山西到河北的战略通道。刘少奇来到北平后，首先恢复了北方局与中央的联系，在建立根据地和扩大组织的问题上，经总书记张闻天批准，将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等61人，以“自省”的方式解救出狱，为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保留了骨干力量，这是第一次的解救。

“西安事变”后，红军主力开赴华北前线，周恩来副主席于1937年3月13日、18日致函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并转中共河北省委，要尽快把东北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总的救亡团体。同时，周恩来副主席还指示“国民党上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澜波，具体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3月下旬刘澜波来到北平，向中共北方局“东特”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经“东特”党组织研究决定，由刘澜波、高崇民、张希尧、苏子元、栗又文负责筹备工作，并邀集有影响的爱国人士车向忱、卢广绩、陈先舟等成立一个抗日救亡组织，这个组织由周恩来亲自定名为“东北救亡总会”。“东总”经中共北方局批准后，建立了以刘澜波为书记的地下党组织，并直接归“东特”领导。“东

总”与在南京的周恩来是怎样联系的？当时恰逢苏子元从苏联回国，来北平筹建地下电台，开展情报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国民党上层得知，宋哲元部在7月28日撤离北平前，特务机关要将关押在“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的李大钊侄子李海涛，直中特委组织部长郭芳等重要共产党员全部杀害，他要求北平地下党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武装，打开第二监狱救出里面的同志，可是这时的红军队伍还远在陕北，北平的周围哪有我们的武装，如果有，他们又是从哪儿来的？



打开北平第二监狱

救援武装是“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原型部队

时间我们从1932年12月15日谈起，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发布了《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平津的紧急通知》，文中要求：“派大批干部去领导东北义勇军反日战争，扩大已经组织的义勇军，输送到前线进行反日的民族战争。”辽宁义勇军二军团五支队独立大队，在唐山市委沟帮子铁路党支部王北成的领导下，在32孔桥打响共产党武装抗日第一枪，消灭大虎山火车站鬼子骑兵中队（60人）后，扩编为辽宁义勇军二军团骑兵1团。

1933年1月，日军在山海关再次挑起战端，北平地下党给王北成发来指示，要他们到热河贝子府接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送来的武器，参加热河抗战。但是，由于唐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北



聂耳热河路线图

成返回唐山，部队交给北平地下党组织。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驻辽宁义勇军二军团联络员高鹏（后任东北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受北平地下党的指示，给辽宁义勇军二军团骑兵1团带来党的指示，同时将募集来的4门迫击炮、数百发炮弹，送到热河境内的贝子府，刘凤梧出任迫击炮连连长。

在贝子府与朱碌科之间有个四家子镇，是贝子府通往辽宁建平（叶柏寿）和朝阳的交叉路口，辽宁义勇军二军团骑兵1团从贝子府经这里向朱碌科进发。聂耳受党组织左联的派遣，随上海“热河抗战慰问团”前往北平，一同前往的还有上海工商联合会会长黄炎培、“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革命烈士）等。1933年2月17日，北平地下党秘密组织上海“热河抗战慰问团”和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中的共产党员成立宣传队，与张学良一同乘车前往承德。19日，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军事部长王化一（二军团军团长，没有到职）、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带领宣传队到前线朱碌科慰问辽宁义勇军二军团骑兵1团。

在朱碌科，刘凤梧看到一个清秀又活泼的年轻人带头高喊宣传口号：“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国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目光炯炯有神的聂耳来到了骑兵1团战士的中间，当他看到猎猎的战旗已是弹痕累累，战士们的身上也是血

迹斑斑时，他从战士们的身上已经体会到一股从战场上带来的炮火硝烟，这是聂耳在热河前线首次见到血战日军的东北义勇军部队。他激动地听着战士们讲述夜袭32孔桥、痛击大虎山火车站鬼子骑兵、伏击鬼子巡道车的故事，他听着听着热血就开始沸腾，他深深地体会到：“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鬼子的屠杀面前敢于奋起抗争，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救亡图存的希望啊！”于是，他招呼摄影师张慧冲用摄影机把这支英勇的部队记录下来向全国宣传出去。于是，摄影师张慧冲就拍摄下了这支队伍的英姿。（附张慧冲在朱碌科拍摄的义勇军骑兵图片，骑白马者为刘凤梧）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和田汉在亲身经历的火热生活中原创的，创作背景是聂耳和田汉所参加的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创作原型是共产党领导的辽宁义勇军二军团骑兵1团。因此，聂耳不仅是人民的音乐家，也是革命的活动家。聂耳在前线接受了党的考验，1933年春天，田汉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北平地下党在辽西建立义勇军的历史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中国劳动组合北方区主任罗章龙到辽（宁）西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组织工会。当时，北方的产业工人除了煤矿、纺织、码头外，工人运动主要还是在铁路工人中进行。1922年4月中共唐山市委成立，并以唐山修造厂为中心开展活动。辽西沟帮子火车站是唐山通往锦州、营口的枢纽站，站里有个机车修理厂，行政上归唐山修造厂管。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北方区委从长辛店机车厂转移到唐山修造厂的党员超过满洲（关外），于是党组织借着往沟帮子派工人的时机，向辽宁发展党员。这样，从沟帮子到沈阳、营口之间的三角地带，便成为北平地下党开展活动的地方。长城抗战辽宁义勇军失败后，二军团骑兵1团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由公开转入地下。



锦州义勇军纪念馆刘凤梧

锦州义勇军纪念馆刘凤梧塑像

北平地下党领导的辽宁义勇军再次崛起

1937年2月，刘少奇指示中共北方局“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东特）书记苏梅，以北平地下党保留的原辽宁义勇军二军团骑兵1团为基础，充实昌平白羊城子弟兵，在白羊城组建了平西游击队。中共北方局在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后，“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东北救亡总会”，立即与在妙峰山一带活动的、我党领导的“平西游击队”联系，准备武装解救这些难友。

关于这支部队的性质，和成立的时间，军内文件是这样批复的：鉴于刘凤梧同志1937年2、3月间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筹措枪支，准备组织抗日武装的活动，1937年5、6月间受党派遣参加了平西游击队的组建工作，根据中组部、劳动人事部中组发（1982）11号文件的规定和总政治部（1983）政干字第459号文件规定的精神，经研究确定：刘凤梧同志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37年2月算起，入伍时间由1938年1月更改为1937年5月。这个文件说明，平西游击队组建于“七七事变”前，其性质是我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是忠诚执行党的指示打北平第二监狱的队伍。

中共北方局派联络员高鹏急急忙忙来到妙峰山找到平西游击队队长刘凤梧，要求部队无论如何也要在国民党撤退前，打开第二监狱营救出我们的同志，可是面对这么艰巨的任务，监狱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援兵随时会赶到，父亲刘凤梧担心人手不够。高鹏说，他再去联系一下从辽南来的“国民抗日军”赵侗，他虽然不是我党领导的，但在一

起合作过。高鹏回来后，表示赵侗同意合作打第二监狱。不久，“东总”又派了两个通信员（地下党员），向妙峰山的平西游击队送去“紧急指示”。上面说，国民党要在月底撤退前，将关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的“政治犯”全部枪毙，里面有李大钊的侄子李海涛，党员韩庄、郭芳、杨诚、马戟等，指示中强调：22日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营救出这些同志，特别是“章字号”“洪字号”牢房。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还派杜柏华（后任晋察冀军区卫生处长）以医生看病的身份，对第二监狱实施了抵近侦察，同时还派出王远音等一些同志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充实到赵侗的队伍中。

刘凤梧和昌（平）宛（平）根据地县长焦若愚、党支部书记那恕、高鹏商量后，召开了大队长以上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做了战斗动员，并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由一大队长陈品才带领白羊城子弟兵组成突破组，破坏电线爬墙进去，消灭把守大门的哨兵。二大队长尚英、佟旭野、带领辽宁义勇军组成突破2组，破坏电话线，从另一侧爬墙进去消灭里面看守牢房的哨兵。刘凤梧带领掩护组，在外面用两挺机枪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点，守住大门。三大队长姜声和那恕担任预备队。行动计划制定好后，部队从领导到每名战士都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他们在准备好干粮的同时，又动员当地的老百姓组成了担架队。这时，父亲刘凤梧的腿伤还没有好，是高鹏和那恕给他借了个毛驴带伤参加了战斗。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部队开始从下清水出发，半夜过的永定河，这时的河水由于大雨已经上涨，白羊城子弟兵就把刘凤梧给背了过去。

7月21日清晨，部队到了大觉寺，高鹏和那恕下山向赵侗传达刘凤梧的行动方案和联系暗号，以及如何组织这两支部队的协同动作。21日晚上9点多钟，刘凤梧带着部队在“东总”两个通信员的带领下悄悄地包围了第二监狱，这时赵侗也用暗号和刘凤梧取得了联系，他们与刘凤梧的协同方案是，由吴敬宇佯装日本人去骗敌人开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保证平西游击队登城的顺利进行。吴敬宇

领着一伙人来到了大门前，守门的敌人突然听到下面有人喊：“快开门，大日本皇军来了！”由



大觉寺指挥所及养伤地

于天太黑他们看不清。吴敬宇就用日语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与此同时，陈品才和尚英、佟旭野剪断了电灯线、电话线和铁丝网翻墙进去直奔大门和牢房。这时，吴敬宇也骗开了大门，父亲刘凤梧带着部队冲了进去。

刘凤梧一进门就看见佟旭野已经把看守的枪下了，尚英和陈品才也已经到了大门口，他们继续往里冲，等到了中间的八角形大厅一看，里面是八卦门，每扇门都设在“八卦”的角上反锁着，地面铺的青砖，非常的阴暗潮湿，他们在里面左转右转怎么也找不到难友，于是就大声呼喊：“章字号，洪字号在哪里？我们是义勇军，是抗日游击队，是来救你们的！”当刘凤梧喊完之后，只听见里面一阵咔咔的乱响，原来是“章字号”的难友们正在砸门，紧接着李海涛砸开了牢门从里面走了出来，刘凤梧和他见了面，由他领着把所有的牢门打开，六七百名难友终于被解救了。

刘凤梧一看难友们都被解救出来了，就决定趁敌人还没有发现立即实施转移，他部署陈品才、尚英担任前卫，他和姜声在后面担任掩护，等平西游击队安全地撤出后，赵侗也带着部队撤出来了，他们走出十多里地后，在一个坟地里休息。这时，那怨开始作暂短的动员，他简单地向难友们介绍了“七七事变”后的形势，动员难友们参加队伍，当时只有少部分表示愿意回家，大部分都参加了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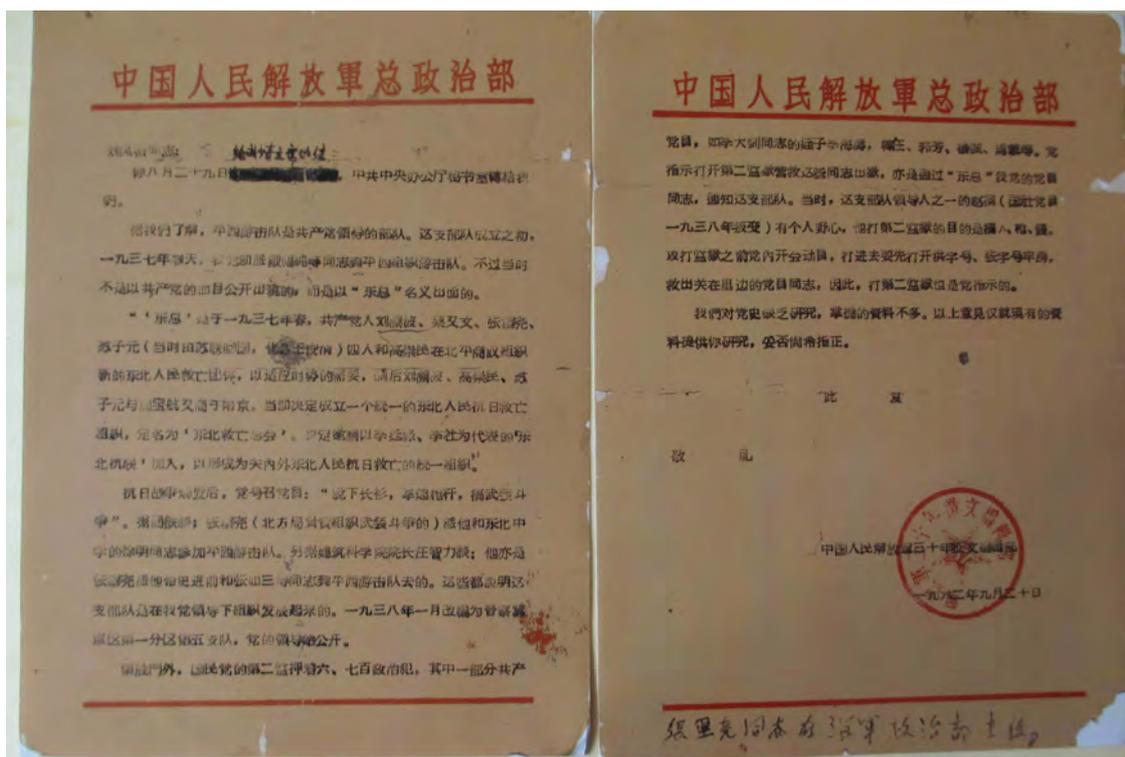
伍。于是，难友们排成了三路纵队，第一路和赵侗走了，第二路和宋明皋走了，第三路和刘凤梧走了，来到平西游击队的中共党员有郭芳、韩庄、王结清、黄秋平等，还有“一二九”运动的民先队员，部队连夜回到了妙峰山。

历史的一个误区

关于攻打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的时间，敌人在当年国民党控制的右翼报纸《北平晨报》和敌伪档案材料里把时间改为8月22日，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把敌人提供的时间作为我党打北平德胜门第二监狱的历史依据，这个错误一度给我们营救出的同志带来天大的灾难，这些同志在受到审查时，组织调查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撤走前，和日军占领后都没有杀你们（共产党员）？你们是怎么从（8月22日）日军的监狱里出来的？广州军区炮兵司令韩庄就是刘凤梧给他作证才免受牢狱之灾。

当年，组织审查他们的依据是：国民党军7月28日撤离北平，日本朝鲜占领军（日军）第20师团（2万人）从丹东入境，于8月4日举行占领北平入城的。北京就两个监狱，日军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不接管？进城后他们就迅速与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华北占领军（一个旅团）、通州的冀东伪政权控制了整个北平城，8月8日日军第5师团（2万人）以德胜门为进攻轴线，与密云的关东军两个旅团，共4万人夹击南口国民党军队，南口战斗爆发。此时，德胜门第二监狱正在敌人进攻南口的轴线上，22日也正是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直到8月27日南口战斗才结束，此时的日军在北平至少有4个师团（7万人）的兵力，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打开第二监狱根本是不可能的，要想出狱只能是投敌叛变，因此说，这个时间是敌人有意布下的陷阱。

关于打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的真实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刘风梧的回信

1962年8月29日刘风梧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写信问到：“平西游击队是不是党领导的，打北平德胜门外监狱是不是党指示的？”9月20日（总政）回了信。信中说：“刘风梧同志，你给刘少奇主席的信，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转给了我们。据我们了解，平西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支部队成立之初，1937年春天，我党即派戴福纯等同志到平西组织游击队。不过当时不是以共产党的面目公开出现的，而是以‘东总’的名义出面的……，1938年1月改编为晋察冀军区5支队，党的领导开始公开。德胜门外，国民党的第二监狱押着六七百名政治犯，其中一部分共产党员，如李大钊同志的侄子李海涛、韩庄、郭芳、杨诚、马载等。党指示打开第二监狱营救这些同志出狱，亦是通过‘东总’我党的党员同志，通知这支部队。当时，这支部队领导人之一的赵桐（国社党员1938年叛变）有个人野心，他打第二监狱的目的是搞人、枪、钱。攻打监狱之前党内开会动员，打进去先打开‘洪字号’‘章字号’牢房，救出关在里面的党员同志，因此，打第二监狱也是党指示的。”

永远飘扬的旗帜

北平地下党出于统战的需要，将平西游击队与国民抗日军合并。1938年部队与挺进华北的杨成武部汇合，成为晋察冀军区五支队（师级）兼五分区。五支队司令赵桐私自离队后，邓华带领3团（欠3营）接替五分区，五支队被解体，一、二总队补充到2团、1团，刘风梧所在的（平西游击队）三总队保留原来的建制，与原3团3营长肖应棠带领3营并入，改为3团（四四编制）。这支部队一直保留到今天，它就是北京军区65集团军193师577团。

从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获救的共产党员，后来又成为冀东大暴动，以及我党在各地的重要骨干，他们有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李海涛、铁道部副部级待遇苏梅、河北省副省长郭芳、广州军区炮兵司令韩庄（少将）、轻工业部顾问（正部级）马载、八机部（局级领导）韩培义、工程兵司令部后勤部副部长（军职）王洁清、烈火金刚作者——刘流等一大批人。

注：笔者根据父亲刘风梧的生前回忆所著

五星红旗是怎么印制出来的

□ 阮珍珍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景象，我心中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

那么，国旗是怎么印制的？这里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呢？这就要把时光倒回到1950年前后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印染业无论规模和技术条件均达不到印制国旗的要求。所以当时的五星红旗是用红布做的，黄色五角星是用黄布扎到红布上制成的。在1950年第一个国庆节的前夕，西城区军属工厂的几位技师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主动进行技术革新，将五星红旗印制了出来。

西城区军属工厂坐落在太平桥大街屯绢胡同西口路北的一个大院子里，是一座带有红砖红瓦二层楼的庭院。军属厂的印花组承担了印制国旗的光荣任务，全组成员兴奋地说：“这可是我们这个小厂第一次为祖国印制国旗啊！”

大家集思广益，周密策划，先进行了几次试验，确定了黄色配料的浓度，然后制出五角星的版并将其在裁好的红绸子上定位放好，由一位技师用刷子蘸匀颜色仔细操作。然后把红旗安放在一个工具上加温，使染料在高温中起化学变化，将红色拔出，再将黄色染上。20分钟以后，大家把红旗放到大木桶里洗去上面的浆糊，再放在绳上晾干。据当时的一位技师回忆说：“奇迹发生了，晾干的旗子露出美丽的色彩，五角星显露出金灿灿的光芒！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喜



悦的泪花滑过我们的脸颊，在朦胧的视线中，那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永远地印在了我们的心底。”

西城区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拥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些年轻的军属工厂技师们能主动进行技术革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献上自己的一片心意，彰显了西城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一片赤子之心。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更应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识”和“红墙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设好首都功能核心区。

时光荏苒，69年来天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见证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也将见证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屹立于东方！

昔日人生观大讨论主角“潘晓”的人生走向

□ 郭海霞

1980年5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来信，这封题目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信，诉说一位青年对生活满怀憧憬，在实际生活中却屡屡遭受打击，该信引发了轰动全国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的人生观大讨论，讨论持续半年之久，该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杂志社先后收到6万份来信参与讨论，之前发行200万份的《中国青年》，那期杂志发行了397万份，达到《中国青年》发行量的高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笔者有幸找到引发80年代那场闻名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主角之一——黄晓菊，1955年出生的她，经过几十年岁月磨砺，走过了什么样的人



青年黄晓菊

生道路？笔者就此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让我们结合她生命中的几次重大选择看看她的人生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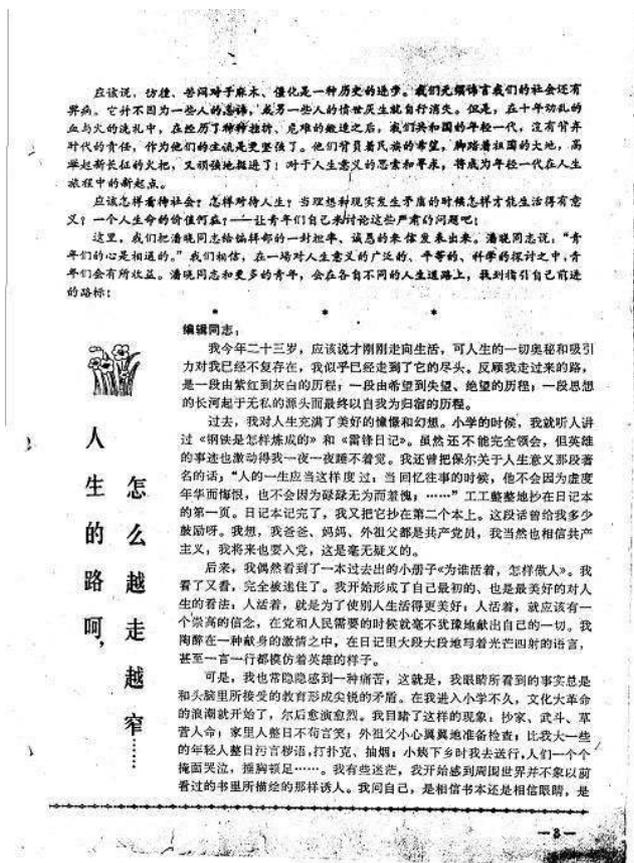
我们在长安商场旁边的星巴克咖啡馆见面，黄晓菊慢慢喝着抹茶口味的拿铁咖啡，与笔者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她不久前刚接受了一次外伤手术，身体还在恢复之中，所以近两

个月都没有下楼。虽然身体比较虚弱，黄晓菊还是欣然答应与笔者在离家不远的这家咖啡馆见面。她给人感觉很坦诚，语速很快，对于笔者的提问，她直抒胸臆，她有一句口头禅“您懂我的意思吧？”正如她对自己的评价一样，“喜欢表达，而不是憋在心里”，她愿意坦诚相见，渴望别人能读懂她的内心世界。她认为真诚是最重要的品质。

磕磕绊绊几十年岁月中，黄晓菊一直在追寻人生的意义，寻找心灵的家园。童年的亲情缺失对她的影响是深刻的，她没有因此而变成孤僻的人，而是更加渴望与人沟通。她努力坚持“站着挣钱”的自尊，面对失业、离婚等一系列重大的打击，她仍然坚持自己敢想敢说敢做的“真性情”，看来生活的磨难并没有磨平她的棱角，对于年轻时的“文学梦”，她仍然念念不忘于心。

成为“人生大讨论”主角

黄晓菊的母亲是北京人，年轻的时候自愿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到包头去开拖拉机。在组织的



潘晓来信

介绍下母亲与当军人的爸爸结婚，留在了包头。黄晓菊是家里的长女，1955年出生，当时条件很艰苦，妈妈奶水不够，奶粉、牛奶在当地都很缺乏，黄晓菊因此身体很弱，患上了黄疸型肝炎，因严重缺锌，还患上异食癖，表现就是到处吃土。为加强营养，于是黄晓菊从一岁就被送到了外祖父家，后来父母又生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本来父母打算让她过一段时间就回内蒙去，她每年放寒暑假也都回内蒙父母家，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她已经适应了北京的环境，而且从小离开家，与父母和弟弟妹妹在感情上产生很强的生疏感，也就不愿意回去了。

黄晓菊1972年初中毕业，他们那届初中毕业生，三分之一上高中，三分之二插队，黄晓菊因严重的关节炎，免修体育，因此没有资格上高中，也不能去插队，在家待业了两年，整天为前途而担忧。当时一个同学的妈妈是月坛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让她把情况写一写，向组织上寻求帮助；过了一段时间，黄晓菊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在这个街道为残疾人办的工厂，从1974年开始她干了七八年。在这里出现了新的烦恼，难道就这样一辈子与机器打交道吗？完成工作后，就到处找人聊天，聊来聊去也没有人能化解她的烦恼。

为排解精神的苦闷，黄晓菊在青春期读了很多的名著，比如说《怎样做人 为谁活着》《简爱》《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呼啸山庄》等书籍，当时的书很少，都是三天两天就要还，因为书的传阅率很高，所以磨损率也高，书边都磨毛了，经常会缺页破损，尽管如此，丝毫不影响这些年轻读者如饥似渴的热情，看完以后就跟小伙伴聊感悟。“我在书中找到了共鸣，原来书里主人公也有和我一样的苦闷，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感觉很亲切。如果一辈子就举一本书的话，我就选择《简爱》。”

《简爱》女主角对社会命运的不妥协，对自我的勇敢探索，对平等、独立爱情观念的坚守，给黄晓菊留下了

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她说出黄晓菊一直想说，而苦于无法准确表达的思想和情感，通过读书，黄晓菊更多地发现了未知的自己，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在黄晓菊的记忆中，大概是1978年或1979年，她开始参加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一个文学培训班，在这里遇到了李燕杰老师。李老师在课上有好多人的感悟跟学生们交流，他的提问也不是按考试大纲来提问，而是很自然地触及到个人的经历，引起人的思考，大家听得非常舒畅。黄晓菊说：“李老师当时讲的课，我记得是‘德才学识与真善美’这个主题，他把‘德’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才学识’，‘真善美’中‘真’是首要的，没有真，哪来的善和美，虚伪的善和美不存在。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觉得他的排序是有道理的，他很不一样，他当时讲的内容现在看来都很时尚。我经常在课堂上提问题，也不是局限于小说，很多都是探讨人生问题。我当时还和同学们去过李老师的家里。李老师性格外向，善于表达，在生活中也是喜欢点燃别人，他对别生命体的那种关注，愿意用自己的热情去影响别人、正面引导别人，对我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客观上在那个许多青年都处于彷徨和困惑中的时代，有一个正向的引导作用。人生就是走向死亡，从这个角度看，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是向着死亡往前走呢，还是向死而生呢，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如果我当时遇到别的教授，如果他是灰暗的、阴郁的、负面的，那我也肯定会受到他的影响。李老师是向死而生的，他对我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是一个好老师。直到现在，我也不太关注物质层面的东西，我的奢侈品是希望人能够懂我，那是我的奢侈品。”

在李燕杰老师的联系下，黄晓菊与同学祁大伟采访了诗人艾青，并将采访经过发表在《艺苑蓓蕾》杂志上。

在三里河俱乐部文学班的经历，为黄晓菊打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底色。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收到了很多来信,都在诉说青年的人生苦恼,于是该杂志酝酿在青年中发起一场人生观的讨论。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就开始深入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其中一次座谈会,邀请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大学在校生、在职工人、回城知青等参加座谈会。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文学创作班学习的黄晓菊被俱乐部推荐给编辑部,她作为街道工厂的工人做了发言,会上大家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进行漫谈。

《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征得了黄晓菊的同意,请她把自己的想法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于是黄晓菊用长诗的形式给编辑部写了一篇稿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应该说直言不讳地在报刊上袒露真实思想,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某种程度上,黄晓菊的勇气源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更源于她无法排遣的内心苦闷,她急切渴望与同龄人交流。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许多内容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这封信还揉进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一些话,主要由黄晓菊和潘祎来信组成《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合稿,发表的时候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这封信5月1日刊发,半年内编辑部收到6万多件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

人生的烦恼在“潘晓”来信得到了充分体现,信中写出一位对生活满怀憧憬的青年,在实际生活中却屡屡遭受打击,苦苦思索后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最后发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哀叹。

因自幼与父母分离,缺乏亲子关系、青春期的萌动叠加起来,此时黄晓菊的内心敏感而又脆弱,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想要反抗复杂现实中种种的不完

美,在“潘晓”来信中,黄晓菊用长诗诉说了自己的烦恼,也说出她的文学梦,这个文学梦是支撑她生活的微弱光芒。

在这场轰动全国的人生大讨论中,黄晓菊一夜成名,工厂门口经常有陌生人堵在门口要求见她,要跟她“谈理想、谈人生”,有给她写信的,也有邀请她作报告的,有一些人甚至与黄晓菊成为多年的好朋友。在朋友圈中,有一位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两人一起探讨有共同兴趣的人生观问题,这名男生后来成为她的丈夫。

但成名也带来很多烦恼,黄晓菊在工厂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帮助下,黄晓菊被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在这个新单位,出版社发行部是在主楼外面,出版社职工子女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就把他们安排在那个部门做事,大家的工作任务就是卖书。在黄晓菊眼里,这样的岗位与她“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的期待还是有很大距离,于是她又不安心了。

这时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在这个图书资料员的岗位上黄晓菊仍然是不安分的,整理十几种杂志,别人要干8小时的工作,她经常半小时就干完了,干完后就到北大等名校去旁听。后来获得为单位订阅杂志的权利,想到社科院是研究“人”的单位,于是在专业杂志之外又选择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等,可是在单位机制改革时,却遭遇停聘,罪状之一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各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停聘就停聘。”黄晓菊想,“年纪轻轻难道还怕养不活自己和孩子吗?”于是拿着社科院给的三个月工资回家了。在丈夫眼里,所谓“与众不同”的“潘晓”,在家庭生活中与其他的妇女没什么区别。失业的煎熬再加与丈夫的诸多分歧,两人决定离婚。

在生活的重压中打拼

1988年，离开社科院后，背负“潘晓”标签多年的黄晓菊在痛苦地反复思索“我是谁”的问题。既然离开体制内的工作，何不趁此机会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去闯一闯？此前一直在“潘晓”的标签下生活的黄晓菊想脱离这个标签，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在普通人的人群中能生存下去。

于是，她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姨妈，去海南找工作，孩子第一天换了个新幼儿园，就找不着妈妈了，造成了很大的心灵创伤。想到自己从小就离开父母，到了儿子这里又重演这一幕，黄晓菊感觉很痛心，但很无奈。

她在海南特区报找到了工作，但是整天要低声下气拉广告，她无法忍受这种找不到自我价值的工作，于是毅然离开这家报社。打算去深圳再碰运气。

从海南去深圳的时候，黄晓菊30多岁，由于不会熟练使用电脑，英语也欠缺，找媒体的工作远远不如20多岁的年轻人有竞争力，所以到处碰壁。当时也有社科院教授拿着一摞自己写的书去找工作，用人单位说“我们这缺扫地的，你扫吗？”当时深圳是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不管你过去的资历如何，都要面临从头开始。

转了一圈，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就在她要放弃，想打道回北京的时候，经朋友介绍，黄晓菊听说一个日本人家里需要一个做家政的。刚开始说就是需要一个普通话讲得好、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代替雇主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实际上，到雇主家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样样都得干。男主人是一家工厂厂长，重度残疾，太太是韩国籍，叫索荣花。女主人知道黄晓菊不会干家务，但离婚后急需挣钱养家的机会，便说服男主人留下她，并且手把手地教她。日本人的地板需要跪着擦，黄晓菊从来也没干过这样的活，索荣花就亲自教她，把地擦得一尘不染。黄晓菊本来就有关节炎，再加上要经常跪着擦

地，双膝跪得生疼。好在这家日本雇主的饮食比较简单，早饭总是面包片加煎鸡蛋，正餐基本上都是米饭加白灼海鲜，所以也能应对。工资每月3000元港币，而当时北京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元。有时因人生大讨论认识的朋友来雇主家看她，可是为了不耽搁手头的工作，只能匆匆与朋友们告别。之所以能留下来，一方面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源于索荣花对她的信任与尊重，她与29岁的索荣花还成为掏心掏肺的好朋友。当时有一档女性广播节目叫“月亮湾——女人的港湾”，节目组负责人通过熟人找到黄晓菊。刚开始是去做嘉宾，后来变成热线，黄晓菊成了“知心姐姐”，要回答热线节目中打进来的各种问题。她开始还挺喜欢这个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后，黄晓菊觉得，热线电话只能做到让听众抒发一种情绪，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对他们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她自己在走出广播电台的大门之后，为维持生计，还要回到雇主家继续做自己的家政工作，感觉自己的回答特别虚伪、苍白无力。她再一次选择了离开，告别了“知心姐姐”的角色。

黄晓菊的深圳之行，使她从众人瞩目的“潘晓”做回了尘世中的黄晓菊，使她对自我价值有了更客观的评价。如果说在一切皆有可能的80年代，因“潘晓”来信的成名使黄晓菊成为一种精神符号，一面为许多人所仰望，同时也被另外许多人所批判，那么深圳的经历使她从虚幻的云端落回尘世，经过很多激烈的思想斗争与困惑，她对自己真正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不是理想中空洞的想象，不是别人眼中预设的形象，而是在生活的“泥与土”中生存，真正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完美，凭着每一天的努力劳动争取自己和家人的面包，那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她的最大收获。

坚持“站着挣钱”

在日本雇主家工作了两年多，黄晓菊联系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感觉长期离开孩子不利于他的成长，而

且这种缺憾今后将无法弥补，于是从深圳回到北京。

1993年，黄晓菊回北京加入朋友的服装公司，后来干脆自己干，就是将面料加工为成衣销售。黄晓菊在纸上将衣服款式画下来，交给裁缝做出样衣，再去木樨园进行批量加工销售，这些服装摆进了北京各大商场。因为不善于跟大商场负责人拉关系，黄晓菊的服装常被撵到最不好的位置，比如说厕所边上的角落里。她说：“我的服装有特点，有特别强的时尚感，不怕积压，三年前做的服装，三年后仍然能卖。我的生意没做那么大，因为我的心思一直在生意之外，做生意挣点儿钱，踏踏实实养孩子，然后赶紧做其他我喜欢的事情去。”因为做生意不是她的最终诉求，她自认为是自身的局限性和个性的因素，没有把生意做大，而是单枪匹马在市场里头闯荡了十几年。后来服装的大品牌全面占据了商场，个体户的这些服装品牌被一个个挤出了大商场的柜台。她说：“在每个大商场都是坚持到最后的个体户，这是让我感到很骄傲的事情，商场换了一任又一任的领导，但是我还在。我很骄傲，从百盛最后撤出的个体户就是我。”从各大商场撤出来以后她就在广播电台对面的一个铺面开起专卖店，把卖积压的货都集中在那个店，坚持了几年。但是又受到了网络购物的冲击，每天坚持10到12个小时的工作，经常是无效的劳动，成交率是零。于是聘的导购一个个离开，黄晓菊不得不自己每天在服装店看店。“在那会儿还看了不少的书，很可笑，有时还看得痛哭流涕，顾客来了赶紧把书收起来，但那是我的乐趣，我感觉就是小姑娘的情结一直没有得到释放。”最后某干果专卖店以高于原房租的价格一下子与房东签了十年的合同，她不得不最后离开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意。由于入了社保，黄晓菊在年满50岁的时候办了退休手续，享受到了退休工资，所以生意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新的经济的压力。

黄晓菊通过卖服装解决了生活问题、独自养大了孩子，把三里河外祖父母的老宅子也买下了。对做生意的评价，她自认为自己是个人有能力的人，“强迫

症”般地负责任，有很强的时尚感，服装款式“可以一眼看十年”，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我很善于跟顾客沟通，但是我很多时候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很情绪化。如果我喜欢一个顾客，会跟顾客聊上半天，卖不卖出去东西都无所谓，喜欢跟我聊天，聊着聊着顾客可能一下子买了好多东西。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各色的’，不亲和的，有的顾客很挑剔，我就不能忍受，就会跟顾客吵起来，你认为我的东西不好，我还认为你不是我的顾客呢。我挺明白姜文的那句话的意思‘站着把钱挣了’，站着能不能挣钱，能，但比跪着蹲着比，就少多了，蹲着跪着能挣100，不这样做，站着可能只能挣60，但是我不愿意受那40块钱的气，我就站着挣钱”。

她很自豪能将自己的个性坚持到底，“从年轻的时候交下的朋友，包括因为‘潘晓’交的朋友，再见到我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哟，还那样！’不能说一点没变吧，但仍然保持那种真性情，做生意这么多年，变化肯定是有的，但根本的东西没变。”

再续“文学梦”

对于青年时的梦想，罗曼·罗兰是这样说的：“很多人在半途迷失了。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足够的耐心在任何情况都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等着这束光舒展开来，将这一丝微光牢牢地握在手里。”终于可以不用再为生计奔波，这些年在谋生的压力下而变得有些模糊的文学梦，又渐渐清晰起来，黄晓菊为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在本该享受清闲退休生活之时，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电影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在写随笔，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下来。许多朋友都劝我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我从内心来讲缺少这种原动力，我不需要再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尽管在“潘晓”来信中已显露出一定的文学才华，在出版业发达的今天，个人出版也不再难，但经历了年轻时的意外成名，被许多莫须有的事所左右，被环境所裹挟，又遭遇之后一系列的生活波折，黄晓菊更加感觉

到名利的荒诞，所以刻意地回避可能与名利有关的事情。

但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她感觉还是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又加入电影行业。这个电影公司专门拍一些文艺片，获得很多国际奖项。

黄晓菊说：“其实，我对电影的热爱由来已久。当年在开服装店的时候，宁肯损失每天将近千元的租金，关上店门，只为去电影资料馆一场接一场地看电影节展演，因为好多是平时难得看见的资料片，从早看到晚，一天看四部电影。进入电影行业后，为了获得镜头感，我现在一年要看300多部电影。我善于表达，善于用语言传递内心的感受，又有经历、有生活的积累，我的当下感很强，不落伍，做服装的品位是长久的，所以善于跟90后的导演沟通。我想影片获奖不是目的，生活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能不能再深入一点，再人性一点，挖掘出来，用真情打动人，可以充分表达内心纠结的过程，虽然不完美但一定是光明的结局，能鼓舞人的、真实恳切的故事，能被大众所接受。希望在电影中实现我的文学梦！”

回望来路，当笔者问道：“对于在80年代人生大讨论中所持的观点是否有变化”，黄晓菊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提法太简单机械了，不完善、不准确，我愿意修正这个观点，当时的提法‘为自己与为他人’有先后之分，我（现在）认为不应该是先有后，而应该将二者融在一起。”

在我们结束这场采访的两个月之后，黄晓菊告诉我，说她最近一直在琢磨我们那天的谈话，深感有未尽之意，她在日记里进一步梳理思路，并通过电子邮箱给我发来这段日记：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思想产物。所以它当然也不是一个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概念。它存在的价值只是在当时的精神生态中，撼动了被长期禁锢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体系。唤醒了人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认识自己的人生。所以



黄晓菊近照

它不是真理，也不应是所有人的行为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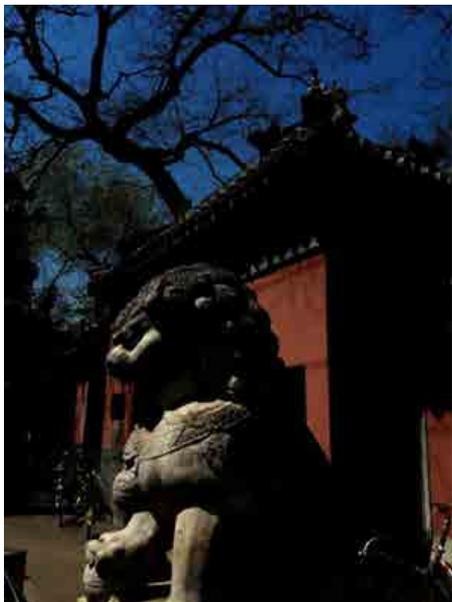
今天的精神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自我’的认知、理解，更加多角度多层面。各人的人生观、价值体系，也会因各人处境的不同，形成认知的差异、趋向意义上的多元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不再仅仅是个‘主观’‘客观’，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它更值得探讨的是一个互相包容、互为成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平衡问题。”

改革开放洪流中的西城区文物保护工作

□ 高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开启，至今已有40年了。在这40年的时间里，西城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今，将西城区范围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要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保护与修缮工作，以大事年表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为读者们展示我们这40年在文保方面的成就。

1979年，北京内城的德胜门箭楼曾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古建筑学家郑孝燮致信党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呼吁保护德胜门箭楼，才最终使其被保存下来。德胜门箭楼是北京城内仅存的两座箭楼之一，另一座便是正阳门箭楼。北京市政府于1982年拨款修缮，且设立了德胜门箭楼文物保管所。1992年复建了原来瓮城之内的真武庙，现由北京市古代钱币博物馆使用。2001年，又在真武庙外垣墙东西两侧复建了值房。德胜门箭楼于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北京市政府对法源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工作。2004年又对法源寺进行了修缮。而今，法源寺已经升格为2001年第五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北京市政府对白云观进行自1956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全面修缮。到了2002年，市政府又划拨专项资金，对白云观进行了新一轮修缮工作。此外，从1994年开始，传统的白云观庙会又开始在春节期间，与广大民众见面，并逐步恢复成为北京市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白云观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1982年，政府对月坛的具服殿及钟楼进行整修。2004年外迁了月坛保护范围内的居民及单位，完成了对月坛文物古迹的修复。月坛于2006年升级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随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的去世，她所居住了近20年的醇亲王府邸花园，被更名为“宋庆龄同志故居”，且于1982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80年代，恭王府花园被占用部分开始腾退。2004年，恭王府府邸部分的腾退工作也告完成。

修缮后的恭王府及花园，于2008年对社会整体开放。恭王府在1982年便成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80年代，原宣武区政府对陶然亭慈悲庵进行大修，并增建了一部分游廊。慈悲庵为1979年公布的第二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3—1985年，位于护国寺街9号的梅兰芳故居，得到政府的修缮与保护。1986年，此地以“梅兰芳纪念馆”的名义正式对公众开放。梅兰芳故居于2013年升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由国家拨款，从西什库教堂的主教府内迁出了北京第三十九中学，并对西什库教堂进行整体装修。西什库教堂在2006年被升级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西城区政府对残留的明代北京城西南角城垣进行保护性修缮，并开始面对公众开放。2013年此处文物升级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天宁寺塔得到重新修缮。到了2002年，天宁寺塔院建筑，也得到了维修与增建。天宁寺塔为1988年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广会馆于1984年公布为第三批北京市

1993—1996年，市政府对湖广会馆进行腾退和全面修缮的工作，后开辟为北京戏曲博物馆，并恢复戏楼的演出功能。

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北京市政府对安徽会馆进行了腾退工作。到了2000年，市政府又开始对安徽会馆的中路北部建筑进行了修缮。目前修缮过的部分，由北京京都文化投资管理公司管理使用，其余部分暂时仍为民居。2006年，安徽会馆升级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西城区政府提出“打开山门、亮出白塔”的口号。与此同时，拆除了白塔寺副食商场。待到2003年，完成了白塔寺西侧的腾退修缮工作，实现了全面的对外开放。

2013年，政府又启动了白塔寺药店降层工作，使白塔寺的身影一目了然。白塔寺为1961年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长期使用先农坛太岁殿的育才学校正式迁出。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于1998、2000年为先农坛提供了修缮资金。2000年，先农坛由国家文物部门收回管理，并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修缮。先农坛于2001年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北京市启动了对德胜门内大街定阜街之辅仁大学主教学楼的基础抢险加固工程。此后，于2008年又对辅仁大学校内的清代花园建筑进行了修缮。辅仁大学本部旧址，也于2013年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2003年，政府对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使用的克勒郡王府进行修缮，并作为其低年级部使用。克勒郡王府是2013年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2005年，西城区政府对地安门外大街的火德真君庙进行了腾退、修缮工作，并交由中国道教协



会管理使用，且对外开放。火德真君庙在1984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西城区政府开启拈花寺的腾退与交接工作。拈花寺为2003年第七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西城区启动了对牛街礼拜寺的修缮工程。牛街清真寺在1988年成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长椿寺内的居民搬迁、寺庙修缮工作基本结束。依托于长椿寺而建的宣南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长椿寺在2001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位于金融街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在修葺完成后正式对公众开放。这里于2013年升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西城区政府出资对万松老人塔周边建筑进行了搬迁、腾退与环境整治工作。2010年对万松老人塔又进行了修缮。2014年的“世界读书日”，万松老人塔及塔院作为非营利性公共阅读空间免费对公众开放。目前由正阳书局使用。万松老人塔于2013年升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2014年，政府分两期对中山会馆进行全面修缮。中山会馆为1984年公布的第三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北京市政府对位于白纸坊街西街的国民

政府财政部印刷局旧址，进行重新修葺。这里目前为北京印钞厂所使用，并于2006年升级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水利部对明光胡同的吕祖阁钟鼓楼进行保护性修缮。吕祖阁于1984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位于西城区大栅栏的劝业场大楼，开始由政府出资修缮，并逐步恢复其商业环境。

2013年，大高玄殿开始正式腾退，并移交故宫博物院管理。此处建筑群，已于1996年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位于西单的“民族大世界”商场关闭。在国家民委与西城区政府专门成立的“西单三十三号院文物保护修缮项目联合工作小组”的主持下，开始对这座曾经的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进行全面的修缮。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于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位于米市胡同的康有为故居，得到腾退及修缮。康有为故居是1984年公布的第三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西城区政府启动了对杨淑山祠的腾退修缮工程。杨淑山祠为1984年公布的第三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区政府全面启动对顺德会馆（朱彝尊故居）的腾退与修缮工作。顺德会馆是1984年公布的第三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西城区无障碍改造工作的回忆

□ 刘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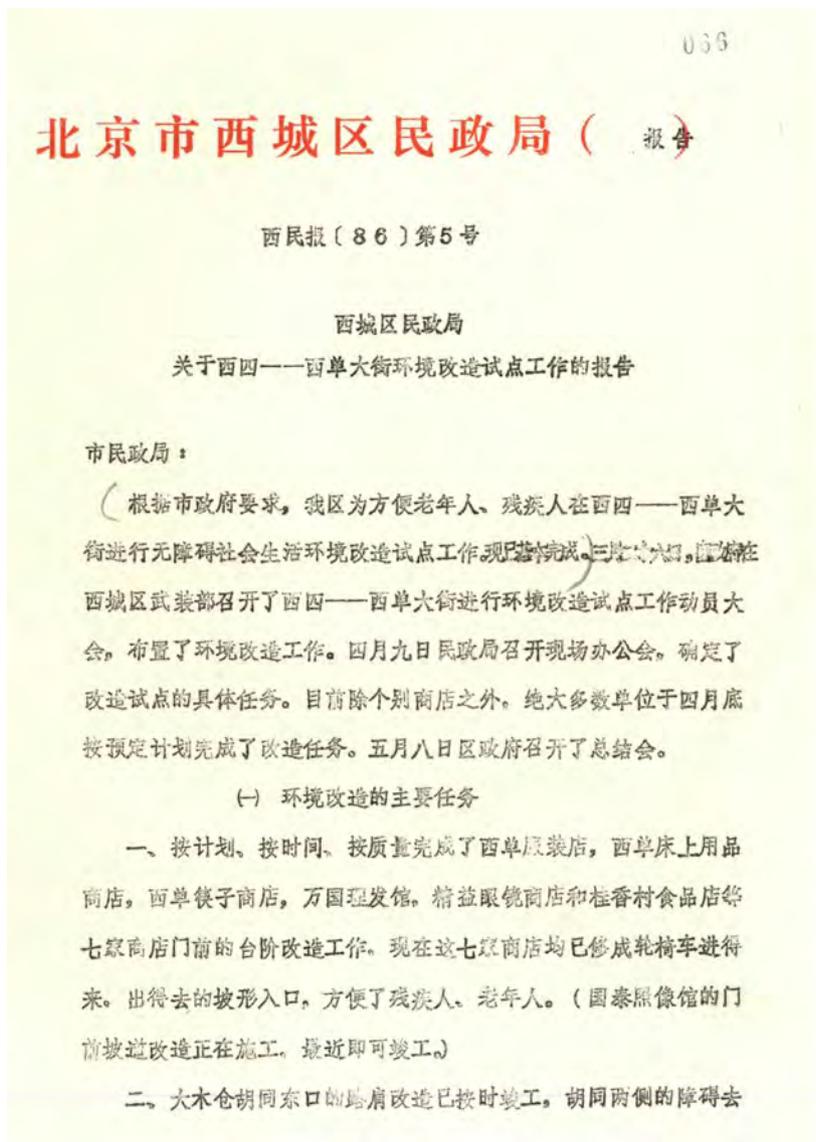
在儿童医院转乘公交车时，突然发现车站旁有一个盲人站牌，经查询得知，北京市有类似的盲人站牌16个。这件事使我联想到，30多年前我参与西城区进行无障碍改造试点工作的往事。

北京市为残疾人创造便利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工作（即无障碍改造工作）是1985年年底开始的。1985年11月5日，封明为副市长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在王府井大街、西四～西单大街等几条街道按国际最低标准进行改造的工作。1986年3月5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会议纪要，据此西城区开展了相应的工作。

最初，这项工作是由区民政局和西城残联负责的，他们对西四～西单大街的沿线商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摸底，制定了改造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了初步的改造项目。工作有进展，但不十分顺利。

当时，区政府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是刚刚从市政府调来的李炳华。当时组织上对我的工作也进行了调整，免去我政府办副主任的职务，任命我为区民政局副局长，因为我在政府办还有一些事务没有完全交接，所以也没有马上到民政局报到上班。鉴于这种情况，李炳华就让我承担了西四～西单大街无障碍改造的工作。

1986年3月20日起，按照李炳华的指示组建了



西城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关于西四～西单大街环境改造试点工作的报告》中记载1986年西四～西单大街无障碍改造工程情况

改造现场的工作班子。由我临时负责组织工作，成员有财贸办公室的谢裕升负责联系各商铺，有民政局返聘的李炳坤负责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这个

班子就我们三个人，说白了就是李炳华直接领导的工作班子。李炳华看到我们的人少，还多次问我要不要再调人，我说够用了。

3月26日，区政府确认了《关于西四～西单大街无障碍改造工作的实施方案》，并在区武装部召开了动员大会。4月9日，又召开了现场办公会明确了有关单位改造试点的具体任务。

改造的试点项目和分工为：一、路肩（即马路牙子）改造工程设计由市政设计院负责，施工由市政工程局负责。主要任务是完成从西四路口至西单路口之间所有胡同两侧的马路牙子都改造成可以通行轮椅的坡道。有的路段还试点铺设了盲道。试点路段安排在大木仓胡同东口。二、安装盲人站牌，由市公交总公司解决。三、安装同步音响指示器，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解决。四、公共厕所的改造工程由区环卫局负责，改造试点的主要任务是将这个地区的公共厕所在原有蹲坑的基础上，增设几个坐便器，同时在靠墙的位置上安装几个L型扶手。在武功卫胡同口内的厕所先试点。五、门前台阶改造工程的重点单位有：西单筷子商店、西单床上用品商店、万里鞋店、国泰照相馆、万国理发馆、西单医药商店、西单服装店、桂香村糕点店、精益眼镜商店和西单百货商场等，主要任务是将商店门前的台阶改成可以出入轮椅的坡道。各项工程统一要求在“五一”前完成。

参照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会议纪要的形式，我们拟写了会议纪要明确了各相关单位的改造任务，下发给各单位。

其间，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建筑设计院负责业务指导工作的高宝真和郭玲，还有区环卫局一位姓董的工程师。

我和郭玲曾到东城区参观过几个厕所的改造项目，记得那一天我们到得早，东城环卫局的同志还没有到，改造项目的厕所还锁着门。我们两人扒着门缝往里面看。这时走过来两位戴着袖章的居委会老太太，冲着我说，这是女厕所。我知道闹误会了。我也没好气地说，我就是来看女厕所的。里面没有人，锁着呢。老太太一看，确实是上锁的，走开了。

为了保证验收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组织了预演。那一天，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高宝真（他本身就是残疾人）亲自坐着轮椅在新改造的坡道上走了一个来回，尝试坡道的效果。

李炳华副区长对这件工作抓得很紧，做了多次批示。建筑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具体地督促指导，承担各项工程的各相关单位积极行动，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们西城区的工作挤进了第一期完成试点工程的行列。市政府于1986年5月10日将西四～西单大街的改造与王府井大街的改造一起组织了验收。验收合格后，副市长封明为为两区颁发了完成无障碍改造试点工作的荣誉证书。

完成了这项工作以后，我们那个临时班子撤销，我也正式到区民政局报到，开始接受新的工作任务。而这次参与无障碍改造任务的完成便成为我到民政局工作的一个见面礼。

老匾 老铺 老故事

□ 高新贞

西城区文化底蕴深厚，每个胡同、每个店铺都有着丰富、精彩的故事。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家的传家宝，一块老牌匾，以及背后的一家老店铺的故事。

我要说的这家店铺就位于杨梅竹斜街70号。这家店的历史要追溯到400多年前，那时它是一家叫“王回回狗皮膏药”的老药铺。这家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老药铺，出售的狗皮膏药是“私家秘方”，专治风湿病，腰酸腿痛，浑身筋骨疼等病。过去，京城百姓常提到的赫赫有名的“三王”，其实就是指王回回狗皮膏药、王致和腐乳、王麻子剪刀，王回回膏药的名声可见一斑。这家老药铺又名“济安堂”，顾名思义即是济世安民；这也是20代济安堂人始终恪守的祖训，同时也寄托着一份浓浓的家国情怀。

我的父亲王亮是济安堂的第20代传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后一位经营者，父亲也正是抱着济世安民、报效国家的理想，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当时，药铺附近有一所“穆荣小学”，父亲每年都要为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捐款捐物，资助贫困孩子读书。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战士很多人被冻伤、冻病。听说我的舅舅马松亭大阿訇要代表宗教人士到朝鲜访问，父亲就安排连夜赶制了一批上好膏药，托舅舅带到朝鲜战场为战士们缓解病痛。1956年，为让更多人用上济安堂的膏药，父亲将传了400多年的秘方贡献出来。他说只有依靠新中国这个大舞台才能真正实现济世安民的理想。

在我家里有一块饱经岁月侵蚀的老牌匾，长长的牌匾上工工整整地写着18个大字“京都济安堂王回家祖传真正狗皮膏药铺。”这是家族历史的见证，更时刻提醒我不忘祖辈们的理想，它也成为我



济安堂的老牌匾

们家的传家宝。2004年退休后，我放弃了单位返聘的机会，重新回到了老宅。看到附件有一所小学，孩子们买书买文具不方便，我便将老房子重新利用起来开了一家小书店兼卖文具。从药铺到书店，变得是商品，不变的是承诺，所以这家书店我仍叫“济安堂”。其实开书店的利润很低，十几年间书店中的每一样东西，小到一支铅笔，大到一套辅导书，从未涨过价，每种商品只挣一两毛钱，整年下来，没挣钱还往里搭钱。经常有人问我：这么好的地段，把房子出租了拿租金多省事。但想到孩子们在书店里看书的高兴劲儿，想到“济安堂”三个字背后的家风传承，想到在杨梅竹这条老街上需要坚守一份情怀，我就坚持下来。

随着北京的城市发展，周围的胡同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2012年起杨梅竹斜街也开始了腾退整治。部分居民搬走了，零乱的电线电缆全部入地，房屋修缮、地面整修、环境绿化，周围原来的早点摊、杂货铺、小超市消失了，越来越多的创意店铺、设计机构来到了这条老街。这条街巷变得古朴典雅，别有韵味。2014年5月，北京市委

书记郭金龙走进了我的小店，当他听我介绍完济安堂的历史由来后，郭书记说，老字号的精神不能丢，要多在如何继承上下功夫。

郭书记的话让我们全家都眼前一亮，是呀，祖辈传下来的济世精神应该继续传承下去，我们要做展示历史文化的创意店铺，也要成为杨梅竹斜街的“新生态”。我立即组织全家人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将家里的年轻人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店铺的改造中来。我的想法得到了家里年轻人的响应，很快女

儿、侄女、外甥女、侄子等一群年轻人开始着手考察、策划、设计、制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曾经的老店铺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创意小店。这里有精选的书籍，还有定制的文化用品，每件商品都富有设计感，还可以提供简餐。我感觉这些还不够，便着手筹备建立家庭博物馆。我从整理自己家的老故事、老物件开始，利用屋顶空间，把伴随家族发展的老牌匾、戥（deng 四声）子、铡药刀、药臼、药锅、老照片等老物件展示出来。“济安堂”变身成富有文艺气息和文化氛围的书吧和特色家庭博物馆。

2015年国庆节北京国际设计周在大栅栏举办，我们的家庭博物馆也正式开业了，每天接待中外游客、学生、居民数百人。10月26日，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走进“济安堂”，称赞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做得好，之后荷兰大使馆专门寄来感谢信，并组织百人团来参观。前不久一位台湾游客在店里看到手绘的老街巷老院落的明信片，爱不释手，给朋友寄了5张，由于是寄往国外所以邮资不够，我主动帮她补上了邮资。不久她寄来感谢信说：“您帮我补上的不仅是邮资，还有一份真挚的情谊。”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走进“济安堂”



济安堂中展示
的铡药
刀、药臼等
老物件

我现在还在继续搜集整理，让博物馆内容更加丰富。我的梦想是这里不仅是我们一家的博物馆，还要成为大栅栏地区的家庭博物馆，让更多的家庭老故事都能在这里展示和讲述。相信有了更多人的热情守护，不仅我的济安堂老店铺，还会有更多的老记忆老故事，都将重现生机，薪火相传。

我所结识的三位西城人(二)

□ 王宝升

(接上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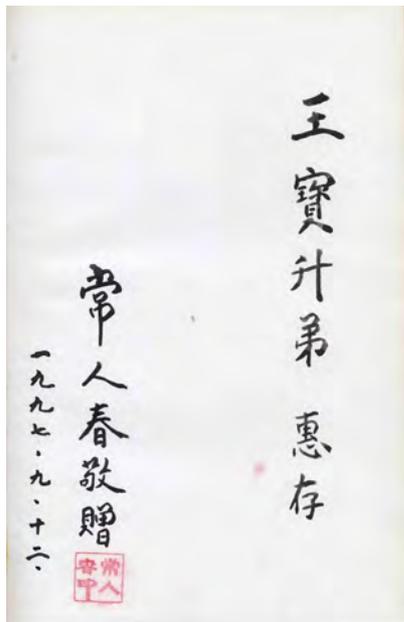
“北京民俗泰斗”——常人春先生

我所介绍的第二位西城人是常人春先生，与常人春先生相识是在陈家骥先生的家，时间是在1990年的某一天。那天，我去陈先生家的目的，是索取学会会刊和西城区文史资料。没想到，刚一进门就见有客人在家，陈老先生即刻给我们俩做了介绍。常人春先生立刻起身热情同我握手并亲切交谈，还把带来的《西城文史资料》送给我。

在交谈过程中，我打量着这位常先生：只见先生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西服，稀少的头发显得有些秃顶，戴着一副眼镜，面目表情凝神专注。说话的时候语气铿锵有力，并且富有条理。

常先生临走时热情邀请我方便时候到他家做客，并详细告我住址。

陈先生对我说：常先生对北京的民俗很有研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现在正在准备《老北京的风俗》书稿。听完陈家骥先生简短的介绍，不禁使我对他肃然起敬。陈先生还说：“这位常先生很早就关注京城民俗，特别是对旧京红白喜事有研究。他从小就注意观察事物，而且还不耻下问，把耳熟能详的北京民俗记



忆在脑海中，肚子里积累许多东西。同时，他还把记忆中的民俗景象记录下来，进行有理论性的钻研。所以，他才能著书立说写东西。”

正如陈先生所言，常人春先生自从出版了研究北京民俗处女作《老北京的风俗》后，在北京民俗研究史上独树一帜，如日中天，享誉京城。以后，相继出版的作品有《老北京风情记趣》《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老北京的民俗行业》《老北京的穿戴》《近世名人大出殡》；合作著书有《古都北京的民俗与旅游》《老北京的年节》《喜庆堂会》《北京民俗史话》等10余部著作。

常人春先生著作等身，享有“北京民俗泰斗”的美称，是北京史研究佼佼者和在京城有影响的人物。先是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专题节目出境做嘉宾，继而是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北京东岳庙民俗博物馆和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工作委员会聘请其为民俗顾问……其传略被《世界名人录》《国际名人录》《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世纪专家》《中国人才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共和国专家成就博览》等15部典籍收录其中。

常人春先生，出生于1933年10月26日，满族，爱新觉罗氏。本名常敏，字玉贵，人春是老先生道名，后为他的姓名。

对于常人春先生的生平事迹和艰难经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京都胜迹》刊载收录于京生写的文章《“旧京风俗通”的后起者——常人春》和日后报刊媒体报道以及西城区档案馆编、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常人春讲北京》都有介绍，在此不再赘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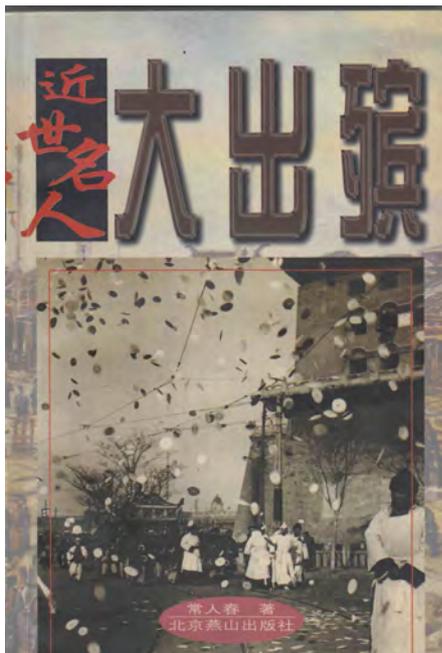
下面笔者将介绍自己与常人春先生从相识到接触的岁月片段。

我是从陈家骥先生去世后开始与常先生频繁接触的。记得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先生刚好忙完《红白

喜事——旧京婚丧礼俗》的写作。到了他家后，常先生热情招呼坐下，并给我沏上一杯热茶。我们进行亲切的交谈，先是对陈家骥先生的逝世表示惋惜，接着他谈了写作《老北京风俗》和《红白喜事》两本书的经过和艰苦历程。他对我说：平时撰写书稿时，他是按照政府职员完成本职工作定额的要求进行的，每天都要必须完成一定的文字量。有的时候，还要按照出版社的要求突击进行写作，忙起来真是天昏地暗的，连饭都顾不上吃，饿了就下点面条，困了就在沙发床上眯一会；由于夜深人静便于集中写作，所以第二天早晨起得很晚。起来之后，上午继续写作，中午吃完饭后休息片刻；下午会客、看书。然后，接着进行……就这样才能按计划、按要求完成出版社写作任务。所以这段时间内，来访者如果不是要紧的事情，他一般都是谢绝来访不会客。

事先，我是和常先生打过招呼的，加之他的书稿已经交到出版社审阅。所以常先生感到如释重负，谈起话来就轻松多了。

交谈中我注意常先生居室，老先生的小房坐北向南，房屋很是狭小，还不足9平方米，真可谓是斗室一间。屋内除了一张小沙发床，就是两个书柜，柜子里摆放着有关北京史地和民俗等方面的书籍资料，柜子上安装着铜锁，书柜玻璃上贴着两个字条，上面写着“图书属个人财产，恕不借阅、赠送”。在进屋的地方，放着炉子，便于生火做饭、做开水；另一侧临窗户的地方摆放着一张写字台，桌上放着



一部电话和书稿资料等。

令人佩服的是，常人春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简陋环境下，写出了许多部北京民俗研究著作，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由于《老北京的风俗》是常人春先生开山之作，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随着该书的出版，常先生可谓名声大振，同时，常先生结识了许多爱好民俗的朋友。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董梦如先生看了这本书，热情邀请他参加协会。某出版社看到这本书也和他约书稿。在后来的几年中，常先生的《老北京的风情记趣》《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近世名人大出殡》……相继问世出版。截至2010年，常人春先生出版的著作（包括与他人合作）共达13部书。上世纪90年代，常先生被北京东岳庙聘请为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民俗顾问。

值得一提的是，常先生出版的大部分书籍，我都有留存。这些书都是常先生亲自赠送给我的，并且在有些书上有他的亲笔题字和印章。

在和常人春先生交谈时，他给我印象是神态有些木讷，精神仿佛有些萎靡不振，行为动作略显缓慢，但是对人总是以礼相待，为客人沏茶倒水，常先生自己不吸烟，却给客人预备好了烟缸……常先生有点耳背，跟他讲话需要大声说话。每当讲起老北京民俗中礼仪、乐曲、曲调时，先生就会手舞足蹈、连说带唱、用手击打着自己的大腿，激情地学唱着，那惟妙惟肖的歌唱和如醉如痴的神态，令人陶醉和兴奋。

我曾经带着丰台区地名办的邢锦棠先生和《人民铁道报社》记者刘仲孝先生到南顺城街24号院共同拜访常先生。他们对常先生执着于北京民俗研究，逆境中不畏艰辛、著书立说表示钦佩。邢锦棠先生在常先生撰写《老北京的穿戴》时，给他提供了旧京乡村穿戴的文字及绘图资料……

我还陪同原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的赵淑珍大姐，专程拜访常人春先生，他们都当过少先队辅导员，谈得很融洽，说到当年少先队队歌以及流行少儿歌曲，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

前……”“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他们竟然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起来，随后便是一阵欢笑和亲切的交谈。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最后常先生答应着抽时间一定多撰写宣武区文史方面的稿件，后来他成为原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特邀撰稿员。

我和常人春先生接触的时间长了，对他的生活规律和习惯就都熟悉了。知道他什么时候写作就不去打搅他，想去拜访的时候提前打电话告知。常先生对我很有好感，愿意和我谈话交流。他经常将自己出版的新作送给我，还叫我和他一道用餐，先生的一手茄子面非常地道。我还被邀请同他的老母亲会面，一同围着桌子吃饭。

说来也是缘分，常先生的老母亲是我们丰台区沙锅村人，遗憾的是，我没有问清是王佐镇的沙锅村还是长辛店镇的沙锅村。老人家见我是丰台区人，感到很亲切，热情招待我吃饭。

1997年的时候，常先生同我商量说：你在报刊经常发表文章，特别是《北京文物报》上发表的文章比较多。我想将你研究北京史的情况写一篇稿子给《北京文物报》“文物爱好者”专栏，向热爱北京文物业余研究者及读者做个介绍。你看如何？我一听连忙摇头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哪里够格呢？”

常先生说：“我介绍你的情况，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经济大潮中，人们都比较浮躁。过去许多研究撰写北京史的人都放弃研究，不是另谋高就，就是干别的事情，有谁还愿意踏下心来，去搞什么北京史民俗呢？而你呢，却能立志不渝，耐得住寂寞坚持搞北京史研究，不为名不为利，坚持写作给报刊投稿，你的这种执着精神真是难能可贵。我写你的目的，一则是向北京史研究爱好者以及读者宣传和弘扬你的这种执着精神；其次，宣传你的事迹情况也是对你的鼓励，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能有更好的成绩。”

听到这番话，我同意了常先生的意见，于是我写了个人的基本情况提供给他，然后又试着写了一篇文章请他参考。最后，经过常先生在我写的稿件基础上

反复修改。并以作者“常人春”署名，撰写成题目为《贵在坚持 锲而不舍——记文物爱好者王宝升同志》文章发表在1997年6月出版的《北京文物报》上。

我深知这是常先生对我鼓励和鞭策，是要我在北京史地等方面研究更加刻苦努力学习。

1992年常人春先生的居住地——阜成门内南顺城街24号院房屋，因建造北京金融街要拆迁。北京民俗学者高巍先生将常先生接到朝阳区呼家楼某小区自己的家中居住，精心照顾常先生的起居生活。从此，他们俩珠联璧合，共同在民俗研究领域发挥着作用。我也曾经几次到朝阳区呼家楼小区探望常先生和高巍先生。后来因为忙于撰写回忆录及其他事宜很少去看他，以至成为憾事。

2015年6月3日我接到西城区档案馆周海南同志发来的短信，说的是“定于6月9日下午2时，在西城区档案馆召开常人春纪念会”。这时，我才知道常人春先生已经去世了。回到家里，我马上上网查阅相关资料，这才知道如下的信息：

《北京晚报》2015年3月28日新闻：

“昨天下午1:36分，民俗泰斗常人春老爷子因心脏衰竭，于朝阳区第二医院过世，享年82岁。”

（注：常先生是1933年10月生人，卒年应该是81岁）

《法制晚报》2015年3月28日以《北京民俗研究泰斗常人春去世，曾被誉为北京通》为题发布消息：

“昨天下午1:36分，北京民俗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常人春先生因心力衰竭，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去世，终年81岁……”

看到这些媒体消息，我为常先生逝世感到震惊和遗憾，同时，我也为没有能再看望他而感到惋惜。

2015年6月9日，在西城区档案馆召开了常人春先生纪念会，与会者座谈了常先生的学术事迹，缅怀他对民俗所做的贡献。《西城追忆》2015年第一期刊发了张新战撰写的文章《深切缅怀北京民俗泰斗常人春先生》；并重印了2003年癸未年九月初八日印制常人春著的《国花少主诗词》。（未完待续）

深切怀念程志华同志

□ 张奇生

程志华同志自从1949年初进入北平，直到1965年，17年间一直在西城地区（含第四区和西四区）工作，曾任区政府科长、副区长、区委办公室主任、区委副书记、西城区常委兼区委工业部长。我和他一直在西城共事，后来又在市二轻局共事，历经20多年。

70年来，我和程志华联系密切，他是我的老领导和相知互信的挚友、兄长。2018年4月15日，志华同志病故，终年96岁。噩耗传来，我悲痛不已，诸多往事涌上心头。经过多日思考，我才提笔书写我所知道的老程，以寄托哀思。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区级党群机关内，一般不称呼职务，习惯称程志华为“老程”或加上“同志”，没人叫他“程书记”或“程部长”，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以下文中，我仍按照老习惯称他“老程”。

程志华，河北省深县人，生于1921年12月。1939年他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十分区雄县县政府视导员、科员，冀中十分区第一联合县政府财政科科员，雄县四、五区区长兼游击队长，容城县四区区长兼游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十分区地委城工部干事，冀中区党委城工部干事，华北局城工部干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任北京市第四区人民政府科长、副区长，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办公室主任、区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常委、工业部长，北京市印刷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无线电联合总厂党委书记，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政治部主任、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局长。1983年离休。

老程7岁时，入私塾学校读书，念了五六年，后来就跟着父亲务农。深县是革命老区，老程受到党的教育，于1939年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冀中军区第五分区的工作，很快调到十分区工作。



1960年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程志华，后排右一为张奇生

他在抗日斗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严酷战斗，经受了艰难困苦、随时牺牲性命的严重考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老程在抗日斗争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河北省雄县容城地区战斗。冀中十分区是地处京津保三角地带的的一个重要地区，他在这里经历了艰苦的战斗，惊心动魄，十分艰险，特别是在1942年前后，日本鬼子疯狂大扫荡时，尤为残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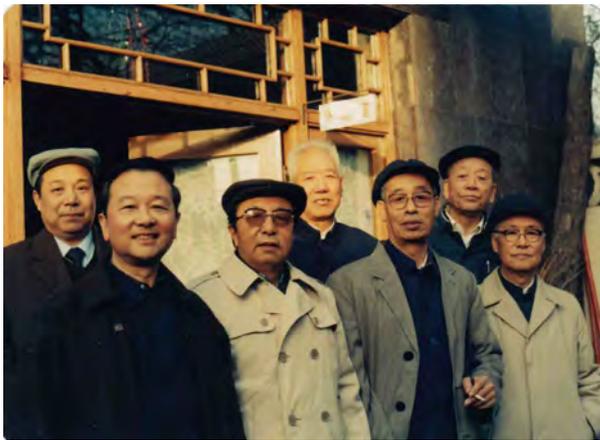
老程在抗日战争中，带领区小队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斗争，杀伤日本鬼子，屡立战功。解放战争中，调他到城工部，开展党的第二条战线的工作。

1948年末，他跟随准备进入北平的大队人马，来到北平郊区，随后进入北平，到四区工作。

我和老程的初次见面是在1949年5月5日，那一天在我当时工作的军管会第17工作组在四根柏小学召开的居民群众大会上，老程代表区人民政府、代表区长李霄璐和副区长魏彬，宣布北平市第四区第十七街政府成立，并委任白凤芷为街长，委任我为副街长兼民政委员，委任韩绍濂、张锐为街政府委员，还给我们每个人颁发了一张委任令。

1952年，我从区工会调到区委任区委工业生产竞赛办公室（随后改为区委工业部）主任，老程从区政府调到区委任办公室主任，不久任区委副书记。随后区委机关建立党支部，老程当选支部书记，我当选支

1992年春，原区委工业部同志聚会合影，前排右一为程志华，前排左一为张奇生



部副书记，经常开会交流，逐渐熟悉起来。

老程善于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从未见他发脾气、训斥人。他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并慢条斯理地摆事实讲道理，还时常有点幽默语言，让人感到和蔼可亲。

1957年“反右”运动中，老程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从未听到他对受批判的同志发表过激的言论，总是态度沉稳冷静。1958年“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工业是重要阵地，西城区的工业总产值“第四本帐”定得过高，基层干部意见很多，但又不说到当面。当时我是脑子发了热，紧跟“风头”。过了一段时间，我观察老程和主管工业的书记张治邦都谨言慎行，头脑不那么热，但又不那么“落后”，我心中为之一动。后来在建国轧钢厂几个问题的处理上，老程和治邦同志也坚持了正确意见。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老程在紧要关头，总是能冷静处事，不随意跟风，始终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党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讲政治、党性坚定的表现。

老程待人热情，关心和帮助同志，在工作中经常对年轻同志讲，到工厂去怎么和干部、工人搞好关系，怎么搞调查研究，还关心同志们的生活和学习。前些年，多年在区工会工作的孙辑黑同志对我说：

“老程真是个好领导，1957年‘反右’刚开始时，老程把我和刘长溪（也是多年在区工会工作的）叫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对我们说，‘反右运动开始了，你们说话办事一定要谨慎啊！’我和长溪听了以后，十分重视，在运动中谨言慎行，万幸没有出事，我一直感激老程同志。”我知道辑黑解放前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喜爱文学，50年代写了不少杂文，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如果从中找毛病，抓个把柄是很容易的，“反右”中幸未遭难。但在“文革”时，大字报说他

是“漏网右派”。刘长溪解放前是中法大学的学生，和我同时调到四区工作，因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得不到重用，心情一直很低落，有时还爱发点牢骚，老程提醒以后，不再发牢骚了，也有幸过关。

前几年，曾在西四区委宣传部工作、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屈英明同志对我说，她被错划右派后，安排在一个化工厂劳动，遇到了困难，她就去找老程诉说了困难，老程很快帮她调到低压电器厂劳动，困难解决了，心情舒畅。1978年平反以后，她一直心存感激，多年来逢年过节她都去看望老程。

区委工业部自建立以来，一直是一支团结战斗的团队，1958年西单、西四两区合并为西城区后，老程十分重视团结问题，他多次强调不分西单、西四，都是一家人。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团结合作，努力工作，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1983年老程离休后，一直关心国内外大事，积极参加市二轻局离休支部的活动，和很多老友都经常联系，互通信息，互相鼓励，生活充实，心情舒畅。他一直赞美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策表示赞扬。他关心海峡两岸的事，关注台湾的动态，关心朝鲜问题如何解决等等。在我和韩绍濂离休后，三人经常通过电话交流，并多次聚会，加深了老友间的感情。但是，近十年来，老程腿脚走动不便，坐上轮椅，下楼不方便了，他每次打电话，都会告诉我“闷得慌”，身旁只有保姆能给他读读报纸。我告诉了几位老友，请他们也常给老程打打电话，助他解解闷儿。老程的老伴走的早点，幸有儿女孝顺，经常来看望他，他的大女儿小英住在他的楼上，小英是中医大夫，精心照顾老程。外孙女杨华昱是博士、西医大夫，在友谊医院工作。小英一家三口都尽了孝心，所以老程当属健康老人，96岁离去，应该就是无疾而终。

我以一首《赞志华老兄》的诗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七年抗倭在雄县，驾舟游击白洋淀。
杀敌卫国立战功，灵活机智勇双全。
奉命转战城工线，工业中坚历久年。
宽厚待人严律己，乐观求实寿长贤。
老战友、老大哥，安息吧！

回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点滴往事

□ 程晓英

我的父亲程志华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他在世时常讲起当年他的抗战生涯，使我们都受到了教育。下面就是父亲在抗战中的一些往事。

周旋白洋淀

1941年父亲在冀中十分区工作，十分区靠近白洋淀。日寇“大扫荡”后，白洋淀成了打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敌人的“扫荡”每每扑空，无功而返。白洋淀斗争离不开船，同志还必须学会游泳，至于还成群的蚊子的骚扰就不在话下了。1942年初夏，父亲和马建民同志等几人乘船到白洋淀，突然看到对面摇船的群众纷纷奔逃，却看不见敌人。往常日寇出来“扫荡”都有汽艇，很远就能听到“嘟……嘟……”的声音。为防万一，父亲把船靠到芦苇荡边上，站在高处才看到敌船已经离得很近了！是狡猾的敌人关闭了发动机，用木掀当桨，也划得挺快。父亲和几个人跳下水，把船推进芦苇荡，在水面上人只露出脑袋喘气。日寇的枪声在头顶响起，打得芦苇乱动，好在并无伤亡。敌人也不敢进芦苇荡，打了一阵枪就灰溜溜地开船撤走了。

以少胜多，夺马夺机枪

1943年，父亲转战四、五区工作，这里最大的据点是平王村，驻扎着15个鬼子，有一挺机关枪，

还有几十个伪军。而这挺机关枪是战士们早就想弄到手的。有人报告说王平村据点的15个鬼子带着机关枪出去了，一会儿就回王平村据点。这是个夺机关枪的好机会！当时父亲只带了10个人，必须出其不意，打伏击，速战速决！战士们在村边土围子埋伏下来，父亲带着一名小队副、一名通讯员到南边观察地形，可就在這時，敌人已经来了，回去是来不及了，父亲他们三人就在南边埋伏了下来。没想到走在鬼子前面的是五六十个伪军！这是没有估计到的。但是箭在弦上，还是不能错过夺机关枪的机会！伪军走过去，鬼子才过来，扛机关枪的鬼子走在最前面，战士们第一枪就把他干掉了。这时走过去的伪军又回来参战，而父亲这边只有三个人，很是危险，他们边打边向伪军喊：“我们打的是鬼子，你们赶紧跑！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加上小队副用的是三天前缴获的快慢机盒子枪，用连发打起来很像机关枪，敌人还以为是遇上了八路军主力，攻了两次没攻上来，立刻就撤走了。这时，父亲他们三个人才回到了战士们伏击的地方。那里，机关枪近在咫尺，战士们也红了眼了，而鬼子趴在路边的青稞中，一见战士接近机关枪他们就开枪打。第一次组织力量没拿下来，牺牲了一个战士，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第二次组织力量压倒敌人的火力，而且每人负责瞄准一个鬼子！才拿到了机关枪，马上转移。这次战斗牺牲了一个战士，打死打伤8个鬼子，缴获了一挺机关枪。这对敌人是个很大的打击，

对群众则是很大的鼓舞，振奋了人心。

在父亲任容城第四、五区区长那段时间，一次，他带着一个通讯员住在沙河村。早晨发现容城的鬼子来了，父亲马上找到一位民兵在村南口土墙边，准备以少胜多，打个伏击！当时，大股的鬼子进入村中，另有5个鬼子骑着马绕到了村南口，战斗一打响，鬼子滚鞍落马，双方互相对射，但是鬼子的马跑了。打伤了鬼子，而村中的鬼子闻声朝这边包围过来，父亲他们三个人迅速下了地道，那5匹马跑到了邻村，被村干部捉住了。这次战斗打伤了鬼子，又得了5匹马，也解决搞大生产的畜力问题。

遭遇敌人，有惊有险

之前和父亲闲聊，常谈及现在的抗战剧写得惊险的离谱，而父亲说那不是夸张，而是写出了当时惊险部分的代表，在整个抗日时期，化险为夷的事情不是少数。下面讲一点儿父亲亲身经历的事。

在敌人“大扫荡”期间，父亲带着几个人在村外跑了一天，又累又饿，大家体力都有点不支。等到天黑了，回到大王村，想做点饭吃，然后再出村。结果饭没做熟，敌人就来了。父亲的通讯员年轻胆大，外号叫“迷糊”，跑了一天，他进屋一头扎炕上就睡着了。别人听到敌人来了，赶紧推醒他说“快跑！”结果别人都从后院翻墙跑了，他认为是朝前跑，出了院门看见门外站了一排队伍，他也站到了队伍中间。后来他突然发现都是伪军！才假托上厕所跑了。因为当时天黑得很，他又大摇大摆背着长枪从前门出来，所以敌人并不认为是八路军。这误会大了。

父亲住在赵村时，一天晚上派通讯员出去办事，父亲则让房东的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带他去找村干部。走到半路时，突然有伪军问“干什么的？！”小孩因天黑没注意是什么人，就回了一句“瞎嚷嚷什么！”这句话起了作用，把敌人给蒙住了，敌人愣在那里不说话了。父亲知道碰上了敌人，此时敌人已经离得很近了，如果这时趁天黑举枪就打，在敌人惊慌混乱时迅速撤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房东的小孩，不能让孩子出差错。父亲当时身披一件棉袍，看不见他身上的装束。他就很自然地哼着小曲，几乎和敌人擦肩而过。走出去一段路后，听到身后一伪军说“像是八路！”另一人回答：“八路敢来吗？”紧接着另一个伪军大喊：“站住！回来！”这时父亲已经走到墙的拐角处，藏在墙角后，听着敌人的动静，如果追来了就开枪。结果伪军见没人回来，也没敢追过来。过了没多久，父亲就带人端了这村的炮楼。

父亲常说，那时遇到玄乎事，还当作笑料来谈。这种乐观是依附一种坚定的信念，就是相信党的领导，相信抗日战争必胜，侵略者必败。

菜市口的维新斗士

□ 靳潇飒

如今的西城区菜市口大街热闹非凡，每日无数熙熙攘攘的车辆行人从此经过，却很少有人留意临街的北半截胡同41号那有些颓败的墙垣下，立着两块文物保护石碑，一块乃是宣武区人民政府与文化文物局早年所立“谭嗣同故居”碑文，另一块乃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北京文物局在2011年前后所立“浏阳会馆”石碑。这两块石碑静静地坐落在这闹市中，默默地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居住过的那位牺牲于菜市口的维新变法斗士——谭嗣同。



浏阳会馆石碑



谭嗣同故居碑文

(1860) 科举中第中进士，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 官至户部员外郎，数十年旅居北京居住于此，因此便成就了谭嗣同“生于菜市口”的事实。早年间，谭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后与唐才常订交，又师从涂启先，汲取了大量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游历全国各地，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思想逐渐变得丰富多元。

甲午年间，清政府败于日本之手，被迫签订丧权

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时年30岁的谭嗣同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他写下“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一诗，表明自己内心的悲愤。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详考数

谭嗣同(1865.3.10-1898.9.28)，字复生，号壮飞，虽为湖南浏阳人，但却因其父谭继洵早年间在京为官之故，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爨眠胡同邸第，由此便“出生于菜市口、成名于菜市口、就义于菜市口”，终此一生与菜市口结下不解之缘。

浏阳会馆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1)庚午六月，是由当时的浏阳宾兴会收购了谭敬甫中丞在宣武城南库堆胡同(即如今的北半截胡同)的宅邸后，逐渐修建完善而成，以方便旅京的浏阳同乡在京城落脚、生活与互相交流。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咸丰十年

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先后创办时务学堂与南学会，并主办《湘报》，撰写《仁学》，从而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开始变法。同年8月，因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并被召见，旋即与林旭、刘光第、杨锐一道被授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开始全力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此时的谭嗣同可谓春风得意，他进京后再次回到了菜市口，住在了浏阳会馆中的“莽苍苍斋”之中，并在此地亲

自题写门联一幅，上联为“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下联乃是“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以示自己革除积弊、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成名于菜市口”的谭嗣同此时得到光绪皇帝信任，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会于宣南地区的陶然亭、法源寺等各地，积极作为、革除弊政、推行新政。其在“莽苍苍斋”的居住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谭嗣同一生中的分量却是极重，他生命中的许多重要诗文、信札都是在这里撰写完成。



浏阳会馆中“莽苍苍斋”旧址

然而维新派操之过急的做法触动了一大批清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更加激化，顽固派开始集中于慈禧太后周围，形成所谓的“后党”势力，向支持维新派的“帝党”势力发动反扑。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政变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北京城内盛传慈禧太后将在天津阅兵之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从而一举扑灭新政。为了挽救局势，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从浏阳会馆起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拥有北洋新军军权的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直隶总督荣禄、起兵围颐和园。然而令谭嗣同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却在两日之后急忙赶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从而出卖了维新派。9月21日凌晨，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进而开始在北京大肆搜捕维新派。面对危局，谭嗣同拒绝出走日本使馆，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将自己所做诗文与书稿交由准备逃往日本的梁启超后，自己留于浏阳会馆内，甘愿被捕。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起在菜市口从容就义，被后世称之为“六君子”。就义前夕，谭嗣同在狱中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并在就义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在其生命中的重要之地菜市口走完了这



谭嗣同菜市口刑场就义

最后一程。1865年3月10日，谭嗣同就出生在离这里不远的黉眠胡同，1898年8月21日到9月25日，谭嗣同参与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36天，“出生于菜市口、成名于菜市口、就义于菜市口”，谭嗣

同之名终其一生与菜市口再无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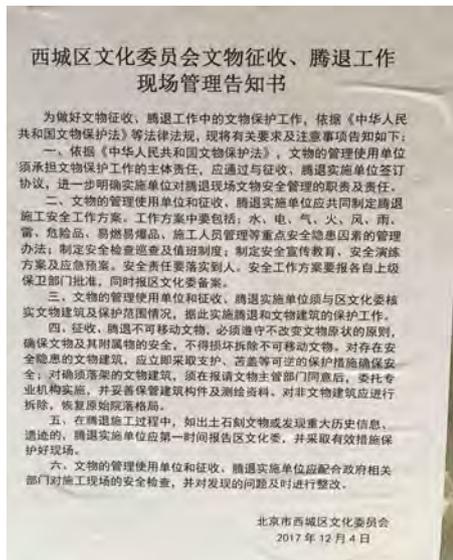
谭嗣同就义后，其遗体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而浏阳会馆则在见证了此段沧桑历史之后，继续默默地伫立在

菜市口外，见证着历史的更替兴衰。1926年8月，已是耄耋之年的康有为在弟子梁启超、张篁溪及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来到菜市口鹤年堂故地，睹物思人、念及旧事，失声痛哭谭嗣同道，“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斯人已逝时过境迁，如今的北半截胡同41号，仍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整栋宅子坐西朝东，青砖飞檐，三进院落，原来的正房依稀可辨，门窗多已被后来人翻修，但椽、檐、梁、柱等依然还是百年前的旧物。巴掌大的庭院如今已被后来搭建起来的棚屋占去大半，留下狭窄的通道，其正中所植的那株老槐却已是亭亭如盖。临街的墙体涂抹着红底的油漆以及白线所描出的那一块块砖线，木头的门槛已然磨去了大半，进出门的大青石经过无数进进出出的打磨，早就没有了当年的棱角。1999年因菜市口丁字路口被打通，原来的北半截胡同东侧房屋全部被拆除，开辟成为双向六车道的宽阔大道。2000年，因“两广大道”的修建，菜市口东西方向街道两侧的房屋也被拆除，昔年的浏阳会馆与谭嗣同故居，在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中面临着消逝的危险。

但党和国家并不会坐视历史古迹的逐渐消亡，自宣武区人民政府与文化文物局相继将谭嗣同故居与浏阳会馆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对其内部的搬迁腾退工作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如今的谭嗣同故居内，张贴着“北京市西城区浏阳会馆文物保护单位”的各种相关文件和通知，也张贴着《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文物征收、腾退工作现场管理告知书》。目前已有不少住户搬离出了浏阳会馆，此百年古居的面貌也正在悄然恢复着。不久的将来，在政府的文物保护政策下，谭嗣同故居与浏阳会馆一定会旧貌换新颜，一定会更好地向世人呈现这位菜市口的维新斗士当年为国赴死的英雄风貌。



谭嗣同故居外景



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文物征收、腾退工作现场管理告知书



北京市西城区浏阳会馆腾退公告

天桥名伶张宝华

□ 马铁汉 刘韶华

张宝华是在北京天桥成长起来的京剧演员，他扎根于这方热土，在一生的艺术生活中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1930年，张宝华生于北京通州。其父张起曾在群益社管理财务，因社长、梆子名旦崔灵芝退隐还乡，社长一职便由张起接任。他把家眷安排在通州大生客栈，便统领剧团在周边各地巡回演出。

1931年，日寇侵华日甚，又有土匪出没，京东不稳。由于形势所迫，剧团返回北京天桥，在歌舞台演出，后因该社内讧，剧团分裂。1937年，张起全家落户北京天桥市场内一独门独院，重组群益社，并着力培养宝荣、宝华兄弟学戏，宝荣学老生，宝华学武生。张起诚聘各路名家前来授艺，如钱富川、丁永利、孙毓堃、钱宝森等。宝华嗓音宽阔，形体彪悍，除了学习武戏外，还向梁益鸣、张宝荣学习文武老生戏。

通过舞台演出实践，宝华逐渐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如在长靠武戏《金沙滩》中，杨七郎挥舞大



《金沙滩》张宝华饰杨七郎、王志刚饰耶律休哥

枪稳、准、狠地左右冲杀，彰显了人物勇猛顽强的内在力量。在《连营寨》中，赵云枪打“抢背将”时，他将身段动作加快，显得干净利落，十分精

彩。又如《铁笼山》中的“打八件”，在与羌族女兵换刀、换枪、换锤、换弓，不仅锣鼓伴奏加快，宝华还多加了一个转身，使亮相更加紧凑、靓丽。

在短打武戏中，亮点更加可观，如在《夜探武家园》（又名《武文华》）中，他扮演的万君兆，身穿抱衣抱裤，即紧身衣、短打扮，足下薄底快靴，十分紧抻利落。在三次“走边”（单人黑夜潜行）时，他将节奏加快，亮相时，表现出“硬中狠”“快中脆”，精神抖擞，神完气足。此外在《花蝴蝶》《白水滩》《赵家楼》等戏中，其表演风格无不如此。

1952年，在群益社的基础上建立了鸣华京剧团。由梁益鸣、张宝华领衔，长期在天桥天乐茶园演出。梁益鸣是马派老生，常演马派剧目，人称天桥“马连良”。宝华以武戏挑梁，兼演其他行当，很受观众喜爱。同年，鸣华京剧团到上海演出，受到观众和同行们的欢迎。在演出的第三天，张起接到一封请柬；原来是京剧名宿盖叫天请客。是日，张起、梁益鸣、宝华、宝荣和剧团的辅导员按时赴约。席间，盖老连连夸赞宝华动作勇猛，武功深厚，并口头称之为弟子。同时提出与他合演一出《白水滩》，以表爱才深情。盖老主演武生十一郎，宝华饰演武净青面虎。当时宝华22岁，正值血气方刚，欣然从命。他从“望滩”开始就使出浑身解数。在“九锤半”的锣鼓点子中，表现青面虎欲挣脱枷锁的急切心情，以极速的“圆场”到“剜泥”亮相，展示了他“硬而快”“脆而美”的表演特点。“打滩”一场使戏达到高潮。当演到十一郎棍打青面虎时，宝华为了表现人物的奋力躲闪和躲避不及，他连续摔了三个“肘棒子”（腾空跃起侧身翻地），最后又翻了一个“镗子”（人体四脚朝天呈元宝形，从空中落下）。他运用的武功艺惊四座，场内掌声热烈，喝彩不断。演出结束后，盖叫天先生十分满意，此后对宝华传授和指点了《赵家

楼》《花蝴蝶》《武松打虎》等戏，使其受益匪浅。

文革期间梁益鸣被勒令离团，不久抑郁而终。1970年，鸣华京剧团更名风雷京剧团，宝华排演了《红灯记》《节振国》《六号门》《审椅子》等现代戏，反响强烈。

改革开放以后，宝华更是活跃。1978年北京风雷京剧团一行8人赴沪观摩学习上海京剧院排演的《甲午海战》；回京后复排演出，宝华饰演邓世昌。这出戏对他来说是个挑战，为了塑造人物的誓死报国、抗击侵略的爱国情怀，他从唱念到身段表演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他扮演的邓世昌身材伟岸，大义凛然，刻画了一名出生入死、不辱使命的清代海军将领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979年，风雷京剧团排演了《三打白骨精》，宝华演孙悟空。早年他的扮相是戴“航空帽”，勾大嘴岔，后来他听了意见，改为京朝派的传统扮相，不仅显得大气，而且符合北京观众的欣赏习惯。与白骨精（边荣巧饰）开打时，还加了巧耍刀枪的“打出手”，更显得孙悟空的武艺高强和神通广大，由于演员配合十分默契，再加上灯光布景的彩头变幻，使这出戏精彩可观，前后连续数十场，上座不衰。

此后他为了挖掘传统，又排演了几出“白胡子老头戏”，如《九江口》中有勇有谋的爱国老将张定边。这出戏是老生、花脸“两门抱”，早年，袁世海的扮相是勾白“三块瓦”，唱花脸腔；李万春则按老生俊扮，二人都戴白满（白色茂密的长胡须），宝华则按老生扮演，他运用唱、念、做、打，塑造了一位久经沙场、忠心耿耿的老元帅的艺术形象。戏的最后，张定边率领护卫军假扮渔夫“跑船”时，表现了激流勇进、乘风破浪的情景，张定边运用船桨开打时更是神勇无敌。当打败徐达率领的兵将后，宝华向下场门由护卫军组成航船翻了一个“出场”（侧手翻接后空翻），从空中落地时，由众人接扶，然后集体亮相，呈现出气宇轩昂、威武不屈的群像。

1990年为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风雷京剧团于12月16日在天桥剧场上演了辍演多年的传统



《溪皇庄》张宝华饰褚彪、王志刚饰尹亮

老戏《溪皇庄》。剧情取自《彭公案》，写《溪皇庄》庄主花得雷是个皇粮庄头，勾结官府，作恶一方。竟将微服私访的三河县县令彭鹏拘禁庄中。在多方邀请下，宝华扮演的老英雄褚彪决定在花得雷寿辰之际，带领一班假扮成杂耍艺人的绿林好汉，混入庄中，协助官兵将花得雷及其党羽拿获。在打“五股荡”的过程中，宝华扮演的褚彪，越过一名喽啰，腾空而起，干净利落地摔了一个“肘棒子”。当时他已年过花甲，但演起戏来，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一丝不苟，场内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此戏连演三场，座无虚席。

1997年为纪念风雷京剧团建团60周年，宝华在长安大戏院演出了绝响舞台多年的传统老戏《剑锋山》。寨主焦振远及其党羽雄踞剑锋山，欺压良善。又接纳了女匪九花娘，将其藏匿寨中。老英雄邱成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联络了江湖伍氏弟兄，攻破山寨，战胜了焦振远，拿获了九花娘。宝华扮演的邱成老当益壮，神采焕发，在混战中，他运用了摔打技巧，翻了一个轻脆利落的“肘棒子”，然后起身亮相，呈现出一副健美的造型。将除暴安良的老英雄的风采展示无遗，令观众惊呼，掌声达两分钟之久。

宝华退休后，受聘于北京市戏曲职业专科学校，教授学生《夜探武家园》及《赵家楼》等绝响多年的短打武生戏，为传承优秀传统剧目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7年10月4日，张宝华因病逝世，享年87岁。

崇元观旧址的三所大学

□ 郑再帅

西直门内大街北侧原有一座崇元观，曾是北京著名道观之一。清朱一新所著《京师坊巷志稿》是一部较全面辑录明清两代北京坊巷胡同的地理志著作，其中记载：“西直门大街，横桥一，名洪桥，俗称红桥。桥南有枯渠，直达宣武门西城根，明之河漕也。……崇元观在街北数十武，明瑄曹化淳建。岁元旦至上元日有庙市。”从中可知，此处原有一条枯渠，民国时填平辟为街道，叫北沟沿，即现在的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佟麟阁路，直达宣武门西面。渠上有一座东西向的桥——洪桥，俗称红桥，现已无迹可寻。不过，鲁迅先生与周作人先生曾居住在八道湾11号，与崇元观相距不远，日记中曾有洪桥的记载：《鲁迅日记》（1919年10月）记：十一日阴，午后往洪桥警察分驻所验契。《周作人日记》（1960年9月1日）记：下午往红桥寄鲍耀明信附书一纸。可作为此桥曾经存在过的见证。

这条干涸的河渠与西直门大街成丁字形相交，即现在的赵登禹路与西直门内大街所形成的丁字形路口，崇元观就在该路口北的东新开胡同内，距大街只有几十步之遥。不过，现在东新开胡同已经与赵登禹路贯通，原来的丁字形已成为十字路口。

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记载，“崇元观在西直门大街北，观门去通衢数十武，绰楔表之，上有三界圣境四字。……玉皇殿扁曰神霄辑瑞，三皇殿扁曰统纪权舆，三清殿曰道德开宗。”崇元观占地面积很大，南面距西直门内大街只有几十米，北面至今新街口四条，东至今东新开胡同。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曾予重修。落成后，乾隆皇帝至此瞻礼，并作《崇元观拈香即事诗》碑留念，此碑现存于北京石刻博物馆，诗云：

观瞻日下属神阜，其旧宁烦事伐磬。
庆落便中纾法驾，崇元疑早会仙曹。
金题重燦云房复，绛节纷朝玉座高。

七字聊因识缘起，楔碑乘暇一挥毫。
椽人何事当夔臬，建筑居然兴鼓鼙。
富贵那曾镇尔辈，裔苗诚未忝其曹。
开门已忘君恩厚，督厂偏夸璫势高。
览古不禁怀鉴古，慎微切切在含毫。

乾隆时期重修后，崇元观达到其鼎盛，以后逐渐衰微。《天咫偶闻》记载：“崇元观，在新街口。明奄人曹化淳建，俗呼曹老公观。正月庙市半月，近已倾圮无余，而市依旧。相传化淳于观中多藏珍宝，以为后人重建地，故俗有观倒观修之谚。然以此翻为观灾，尺椽寸瓦，搜求殆遍，今倒尽，更不能修矣。”光绪庚子乱后，仅余观址。建国后为女十中占用。今此处建有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中学高中部、西城教委家属院、西城区教育研究学院等单位。新中国成立前，在这块旧址上曾存在过三所著名大学，分别为陆军大学（1912—1931）、冯庸大学（1932—1933）、东北大学（1933—1936），这三所大学见证了中国近代波澜起伏的历史。

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是中国近代唯一的一所最高级别的军事学府，它自1906年创立于保定，历经44年之久，是近代中国军事院校中存在时间较长的一所。它不仅是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与高级幕僚人才的摇篮，同时也是旧中国最高的军事学术机关。它的存在对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乃至中国近代军事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仿照西洋军事学院在天津创办我国第一所陆军学校——北洋武备学堂，从淮军及北洋各军选调百余名文员愿意习武者，入堂学习“西洋行军新法”。北洋武备学堂旧军色彩很浓，虽然吸取西



1917年民国北平地图上的陆军大学

方先进的军事教育方法，聘请德国军官充当教习，“于西洋后膛各种枪炮、土本营垒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各法，必能通晓”，以期“可备国家干城御侮之用”，但在思想上仍是灌输旧的封建伦理，并对学生的思想严加控制，“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写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彻，感发忠义之心”。结果，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均惨败，北洋武备学堂也毁于八国联军之役。

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先后创建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武备速成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和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各军事专业学堂，但袁仍感觉不能满足日益发展壮大新军的需要，且军事学校繁多，分布遍及南北，学制纷乱，不利于管理。清政府乃命兵部会同练兵处仿照日本军事教育制度在全国设立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1904年至1905年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我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日俄战争。此后，为争夺开办高等军事学堂的领导权，袁世凯和清政府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906年4月24日，清政府在北京神机营旧址开办了一所由满人控制的高等军事学堂——贵胄学堂，以载润为管理大臣，冯国璋为总办，张绍曾为监督，学生均为“王公大臣各遣子弟”，经费、待

遇非常优厚，希图通过这所学校来垄断高等军事学堂的开办权，培养一批忠于清政府的军事人才。对此，1906年5月8日，袁世凯以陆军随营军官班为基础，扩充成立了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暂在保定将弁学堂内开课，军官学堂按大学堂的标准招生，考生须在本国武备学堂及相当之各学堂毕业，或在东西各国士官学堂毕业领有文凭、品行务必纯正者方可考选。军官学堂的教育制度、教材，均仿效日本陆军大学，总教官及兵学教官亦聘日本将校任之。袁世凯将其视为私有，派自己的亲信段祺瑞为督办，以张鸿逵为监督。自此，中国近代最高军事学府在袁世凯的一手垄断下诞生了。它的创立不仅使中国的军事教育更加系统和完整，也使中国军队的军事学术、军事教育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1907年，陆军部军咨处（1909年改称军咨府）成立，因军官学堂改隶军咨处，因而又被称为军咨府军官学堂，1910年8月改称陆军预备大学堂。1911年，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2月，统治中国270余年的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依靠军事实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因而倍加重视培养军事人才。为便于管理，7月，袁世凯将该校由保定迁往北京西直门内原崇元观旧址，直辖于参谋本部。1913年10月正式命名为陆军大学校，并对学校的教育制度作了重大改革，颁发了《陆军大学校条例》，规定了陆大的组织原则和各项教育制度。胡龙骧任校长，江寿祺任教育长。

1920年后，军阀混战频仍，战局和政局的动荡对陆大影响颇大，学校的财政日益支绌，1923年陆大第六期毕业后被迫停办。时任校长为贾宾卿。1923年10月，直隶军阀曹錕当上总统，为笼络军队中各级陆大出身的军官，遂下令复校，并派师景云为校长，张国元为教育长，继续招收正则班第七期入校。1925年北京政权由奉系掌握，陆大随即由奉系控制。张作霖派张学良为陆大监督，韩麟春为校长，李端浩为教育长。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对奉系军阀的北伐开始，陆大学员纷纷退学，返回原部队，极少数参加

了北伐军。校长韩麟春随张作霖退回东北，学校因此再次停办。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蒋介石即谋恢复陆大并亲兼校长，派该校第三期毕业学员刘光代理校务。经两月筹备，8月，招回离去的学员，第八期恢复上课，同时第九期也开始招生，由此则改变了陆大毕业一期再招收一期的定规，基本上每年都招生，同时有两三个班期在校学习。

第九期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保定军校毕业生次之。这时，因蒋军中许多高级军官都想入陆大旁听，但因每次能批准旁听的人数有限，蒋介石便开办了一个特别班。该班主要招收蒋军高级军官没有进入高等军事学校学习而对蒋效忠的人入学，授以同正则班同样的教育，是为陆大特别班第一期。蒋介石自兼校长，以黄慕松代行校长职务，以周斌为教育长。第八期于1930年11月毕业，共89人。黄慕松到校不久，即奉命他调，校长职务由周斌兼代。第九期及特别班第一期于1931年10月同时毕业，正则班共毕业113人，特别班毕业114人。1932年4月，陆军大学由北平迁往南京汉口路薛家巷。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往长沙，继迁遵义、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除一部分留在重庆续办特别班第八期外，余迁回南京续办，设战术、装甲、空军、后勤、战史和参谋业务6个系。此外设有将官班。南京解放前，陆军大学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期学员在校，后撤至台湾。

冯庸大学

冯庸大学创办于1927年，原校址位于沈阳铁西汪家河子村，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共开设机械、土木、电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700多人，是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大学，也是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

冯庸（1901—1981）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为做大事而散尽家财的奇人”，其父冯德麟（字麟阁）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民国初年曾任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庸与张学良同年出生，二人少时常相往来，情同莫逆，并同在东北讲武堂学习。

1922年东北航空处成立，张学良主事，冯庸任上校参赞。1923年4月16日由东北宁武先生介绍经孙中山先生回电同意冯庸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冯庸升任东北空军少将司令。

创办冯庸大学前，冯庸曾以大冶铁工厂为基础，成立大冶工业专科学校。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于1927年辞去原东北战车总队少将队长一职，捐出巨额资金和丰厚家产，毁家兴学，立志教育救国，献身教育事业。1927年8月8日，冯庸将大冶专科学校正式

改为冯庸大学，自任校长，聘请潘承孝、朱兆雪等著名教授任教，明确提出办学三纲：孝悌忠义，工业救国，受教育机会均等。

馮庸大學(私立)
校址在北平西直門

一編制 本校分(一)工學院機械系,土木系,(二)法學院政治系,法律系(三)文學院國學系,教育系體育專修科

二投考須知 (甲)資格:凡考本大學者須高級中學畢業。(乙)手續:填寫報名書兩張,呈驗畢業證書,及報名費兩元。(丙)試驗科目:(一)工學院:黨義,國文,英文作譯,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微積分,物理,化學,投影量,(二)文法學院:黨義,國文,英文作譯,幾何,物理,化學,本國歷史,西洋歷史,本國地理。

三費用 1.學費三十元,2.體育費四元,3.醫藥費四元,4.圖書費二元,5.保證金二十元(畢業時發還)。

刊载于1933年《全国各大学暨高级中学投考指南》上的冯庸大学招生简章

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就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冯庸教育思想有三，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机会均等”，三是“工业救国”。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现实，冯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武装青年的思想和精神，从而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

冯庸十分注重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也奠定了“冯大”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冯庸大学第一次将军事训练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必修课之内，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规章制度仿照军校制定，学生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都按军队的要求执行；师生间的礼节也效仿军队；军事课不准学生缺课，在校三年以上的学生均须达到下级军官（排、连长）的军事水平；学生外出时要穿呢子衣裤和外套，带法国式圆形军帽，远看去很像军人。当时沈阳人将冯庸大学与沈阳东北军“北大营”“东大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

1929年9月，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策划张学良将军收回中东铁路，引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东路事件”发生。冯庸大学师生同仇敌忾，一致要求开赴边陲守土保疆。冯庸立即组织了300多人规模的“冯庸大学学生抗俄义勇军”，亲自率领开赴黑龙江省海拉尔地区守卫国土。此举得到时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的大力支持，特设专列，载冯庸与冯庸大学的学生北上。在“中东路战役”的西线战斗中，冯大师生英勇顽强，冯庸不顾自身安危，亲自驾驶该校的一架飞机参战。



冯庸在一架英国制造的飞机前留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威逼师生们交出组织抗俄义勇军时使用的一百多支步枪，并将校长冯庸带走软禁，教室、宿舍的箱柜遭到日军洗劫。当晚，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师生在校训练监（训导主任，权利仅次于校长和教务长）南宫拱璧和校秘书长霍维周的

组织、指挥下，集体轻装，在马三家子火车站乘火车撤到北平。张学良同情这批流亡学生，拨给北平西直门内崇文观旧址的前陆军大学校舍收容冯庸大学师生。

冯庸被日军扣押后，先是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现辽宁宾馆），日本人见劝降不成，又将他劫持到日本东京，后冯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逃出，从香港绕道回到北平。1931年10月28日，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张学良参加了开学典礼。

为了激励师生们的爱国热情，教育他们时刻不忘国耻和校耻，冯庸亲手设计了新校旗，原校旗为黄色中间有一圆齿轮，每一个齿轮尖有一个五角星，齿轮中间为一个“工”字，旨在培养工科人才。新校旗改为红黑色相间，在黑色中有一颗黄色五角星。红色代表血，黑色代表铁，以示用铁和血来保卫祖国；黄色五角星的含义是前途光明。在编创新校歌时，冯庸将爱国情感贯穿歌词始终，校歌曲由倡导修身为主旨改变为以抗日杀敌为精髓：

大陆黑沉沉，同胞血殷殷！

人权解放，我们责任；

痛恨那帝国主义，穷凶猖狂！

誓扬民族光，慷慨赴国殇！

百年奇耻，恨难忘！

还我河山，志悲壮！

太平洋中吼怒涛，富士山头毒焰高！

唯有互爱恒敬，唯有矢志矢忠！

猛击自由钟，解放！解放！向前攻！

歌词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将九一八事变定位为“百年国耻”，在当时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针锋相对，激励了很多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学生抗日义勇军”在北平南苑机场誓师成立。1932年1月28日，冯庸亲率“冯庸大学学生抗日义勇军”赴上海真如车站，开赴浏河前线，参加淞沪抗战。1933年初，张学良借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的名义，收编退入热河、热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连同请缨参加抗日的冯庸大学学生，共编成七个军团。冯庸大学义勇军被编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七军团，冯庸任军团



冯庸大学义勇军奔赴前线

总指挥。

1933年9月，经历了近6年办学生涯的冯庸以“国难方殷，前途绝望……”为由告别同学，带着张学良送给他的一万元生活费，携夫人到杭州隐居，冯庸大学随之停办。学生大部分并入北平的东北大学，少数学生转入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继续读书，中学部学生归并到北平天坛中学。冯庸大学退出历史舞台，位于北平原陆军大学校址的校舍改作东北大学总校校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著名的国民党空军英雄刘忠武、阮廷瑞、李洁尘等都曾是冯庸大学的学生，李洁尘在南京空战中英勇殉国。

1948年冯庸赴台，曾任台北市长、“国有财产局局长”“高雄港口司令”台湾电力公司顾问等职。1981年2月15日冯庸病逝于台北。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4月26日，是张作霖统治东北三省时期创办起来的。建校前，奉天教育厅长谢荫昌向张作霖建议：“东西洋各国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张作霖听了深以为然，决定在东北三省筹办东北大学，任命奉天财政厅长兼代省长王永江为校长。

1928年6月4日，日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遇难。28岁的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主政东北。1928年8月，他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捐献出其父留下的大部分遗产用于兴办东北大学以及一部分中小学，先后增聘著名学者章士钊、梁漱溟、刘仙洲、梁思成等为教授。在张学良的领导下，东北大学在办学方针、校舍基础设施建设、院系增设、名师选聘和学生素质全面提高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此时的东北大学，经费充足，校舍一流，图书、仪器、标本应有尽有，俨然成为一所全国闻名的名牌大学。

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承回忆说：“东北大学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天津南开大学二百四十元，北大、清华三百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关内许多名人学者联袂出关不是无因的，文法学院计有黄侃、章士钊、罗文干、邱昌渭、吴柳隅、李正刚诸君；理工学院有冯祖恂、刘仙洲、梁思成、林徽因、庄长恭、王董豪、张豫生诸君；教育学院有陈雪屏、郝更生、高梓、吴蕴瑞、宋君复诸君，皆全国知名之士。”后期，章士钊等人的薪水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形势危急，东大师生决定撤退至北平。先后抵达北平的逃难学生不下六七百人，约为原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师生抵达北平后，张学良在顺成郡王府召见并安抚逃难而来的教授，每人发临时补助费现大洋200元。校方先借安庆会馆、江西会馆、奉天会馆等处安置学生，后借南兵马司前税务监督旧址（后为东校），于10月18日在此开学复课。经校方周旋，高年级学生分别到北大和清华借读，农学院各系学生全部到河南大学借读。1932年2月，又从北平师范大学借得广安门内的彰仪门大街（即今天的广安门内大街）原国货陈列所旧址，收容锦州东北交通大学逃难来平的学生，设立交通学院（后改为工学院），是为南校。1933年，冯庸大学的9个系全部并入东北大学，崇元观旧址改为东北大学校部和文、法两个学院，是



民国北平地图上的东北大学

为北校。

1935年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却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日渐沦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东北大学因在内城而成为“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后又举行了“一二·一六”运动示威游行。东大师生冒着严寒，孤军出动，冲破手持大刀、军警包围，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郊民巷。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斗争中，东大学生中有40多人被捕，在张学良校长写信斡旋之下，营救出了被捕同学。

“一二·九”运动以后，华北局势危在旦夕。1935年底，北平学生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在北平的各大学纷纷外迁。1936年初，正在西安任职的张学良将军筹资15万元，在西安修建了东北大学校舍，将东北大学迁往西安，并在礼堂基石上题词：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
至九一八，惨遭摧残；
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勛尔多士，复我河山！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失去自由。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臧启芳为东北大学代校长，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南迁到河南开封。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东北大学”。6月，学校全部迁到西安。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北大学被迫由西安迁至四川三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大学60位师生被授予烈士称号。1946年5月，国立东北大学师生从三台迁回沈阳，翌年2月在北陵原校址开学。1948年6月东北大学再次迁到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东北大学终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过近70年的发展，东北大学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培养出了众多学界泰斗、实业栋梁、经国之才。

在近代中国近40年时间里，这块旧址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三所著名大学不仅见证了昔日军阀混战、列强侵华的历史，而且他们的师生改变了历史。从这三所大学中走出的无数优秀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奋斗于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他们的智慧改变着这个国家，在各行各业贡献着力量。如今，崇元观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地理志或者北京志著作中的一个名词。然而，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却如烙印般深深地刻在了历史长卷中。

一座记录和见证历史变化的门

□ 杨小燕

不论是久居北京的居民，还是曾经到过北京动物园游览的人，对北京动物园的正门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具有浓厚的西洋建筑风格，有立柱、拱形门和带有精美雕刻的门头、门花。

凡是来到这里的人，多会驻足留影，记录下到此游览的美好瞬间。同样，这里也记录下诸多少少年儿童幸福成长的历程。

这座大门，见证了北京动物园百年的历史变化；同时，记录了中国动物园事业发展的历程。

这座大门，可以说是北京一座有地标性质的建筑。

见证清王朝的灭亡

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是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农事试验场。开放初期，在正门的门花砖雕中间部位上，镌刻着“农事试验场”五个字。下部的门头部分，细细地看，你会发现除了植物、动物外，还刻有从事农事活动的图案。此外东边门洞砖雕靠近左上部的地方，嵌着一个“日”字；而西边门洞砖雕中接近左下部的地方，则嵌着一个“月”字。大概的寓意是，太阳从东面升起，西面落下吧。当时是凡有重要活动时，还会在正门处悬

挂起青龙旗。

当年，商部上奏折给慈禧和光绪，请求在京师筹建农事试验场。其初衷是为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开通风气，振兴农业”，首善之区率先垂范。农事试验场是在乐善园、继园、广善寺、惠安寺及周围部分官地的基础上所建，占地面积达1062亩（约71公顷）。营建历时两年。其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动物园。占地面积仅1.5公顷（约22亩），主要展出端方自德国购买回来的动物。二、植物园。以国内外各种名贵花卉种植为主，还设有大温室。三、农产品试验。在场内广泛种植自国内外采集来的粮、棉、桑、麻、茶、蔬菜、果树和豆类。此外，还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如现在仍保存完好的畅观楼、鬯春堂、鹵风堂、芸芳轩、中式花园（今牡丹亭）等，及早已不存在的万字楼、东洋房等。初建成时，可谓包罗万象。除上述所列之外，还设有矿物、渔具、农具陈列室，动物、农产品标本室，理化室和试验室，茶厂、照相馆和咖啡馆等。门票售价为铜元八枚，孩童、跟役仍是半价票。如要参观动物园和植物园，均需要另外购票。动物园的票价为铜元八枚，植物园的票价为铜元四枚。



清时农事试验场大门



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视察农事实验场

农事试验场东边为售票处，设有两个窗口，分别售男、女游客门票。男票为白色；女票为红色。游人入场由东门进，分男左女右。进门后，有人验票、剪票。在未对游客开放时，慈禧和光绪曾先期参观游览。

然而，农事试验场并不能挽救清政府的厄运。随着清朝统治的灭亡，农事试验场也失去其初建时的辉煌。

民国时期的每况愈下

民国初期，这里更名为“中央农事试验场”。正门上方多是悬挂红黄蓝白黑北洋政府的旗帜。1914年，在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继任农事试验场场长时，曾出现过短暂的辉煌。修葺动物兽舍，购买动物充实动物园，设专人制作动物标本。开设学堂，办讲习所等。

1929~1934年，门的匾额更名为“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此时，这里实际成为国立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基地。受其影响，当时的西外大街，曾一度被称为“博物院路”。1934年后又恢复为农事试验场。



北平天然博物院

1941年后，更名“园艺试验场”。在此期间，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多次下令，要求园艺试验场将动物园内饲养的狮豹全部毒死。在日本宪兵队几次来人督办，拖了近3个月后，园艺试验场不得不将动物园内的狮子、金钱豹毒死，其中一只幼狮尚在哺乳阶段。

动物园自建成后，始终没有变化，只在1943年时添建了猴山。

1945年2月，侵华日军将其作为储备后动物资



1915年，“农事实验场”大门

的仓库，被迫关闭。仅有较珍贵的鸵鸟、鹌鹑、天鹅、桃红鹦鹉和孔雀等13只动物被寄存至中山公园。而培育几十年的名贵花卉，几乎是毁于一旦。因用来养护花卉的温室，被日军改为浴室。许多名贵花卉被放在仓库及院中相继枯萎。

1947年初，准备重新开放时，将寄存的动物取回。而猛兽亭中只能将狮子、豹的标本置于其中。

1949年人民政府接收时，动物园只有3种十余只动物。这个“农场”则是满目疮痍，杂草丛生，虫害达到70%以上。

民国初期，为招引更多的人到农事试验场参观，曾在正门收票处，先后招收过4个身高2米以上的巨人在门口验票。最有名的应是在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时。当时的2个高人在门口验票，时常弯下腰来和小孩逗趣；也时常踮起脚，用手触摸大门上的砖雕。其中叫刘玉清的，还被带到美国好莱坞拍电影，后回国购房娶妻。此2人在鲁迅的文章中也曾提到过。

新中国成立后，动物园事业快速发展

1950年3月1日，经过整修后，以“西郊公园”的名称对外开放。西郊公园4个大字分别悬挂在正门的四根立柱上方。从目前掌握的照片看，此时正门上部原来嵌着“农事试验场”的字样，已改为双狮舞球，其下面还有一只蝙蝠。因这里频繁更名，不能确定究竟是何时改成此图案的。

1950年秋冬，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



西郊公园时期的大门

同志，到西郊公园看望他的老师王国光。之后，又在公园视察参观。当了解到因动物种类很少，游人买票入园后意见很大时，即对当时的园领导指示：“你们要把现有的动物饲养好，再设法收集一些国内的珍贵动物，有条件的时候，到苏联、欧洲等兄弟国家和他们进行动物交换，把世界上一些珍贵动物也收集来，供游人观赏，增加人们的动物科普知识，把北京的动物园办成全国最好的动物园。”

1951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提到西郊公园发展时指出：西郊公园有发展前途，要建设为大规模的动物园，要作长远打算。如虎豹山、猴山等建设及研究动物的管理方法。有机会可能派人去苏联及东欧各民主国家参观动物园，吸取经验，以扩充首都动物园。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之时，为把首都的动物园办好，国务院指令拨款115亿元（旧币），用作国际动物交换费。

1952年开始，公园开始修建象房、水禽湖、鸣禽馆、狮房、黑白熊山等兽舍。动物园的建设从原有的1.5公顷的占地中，逐步向公园的中部和东北部发展。

1955年2月，《北京市公园初步改进意见书》中，对西郊公园今后的发展明确提出：西郊公园除动物应该发展外，应以天然式动物园为原则。同年4月1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正式更名为“北京动物园”。牌匾题字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此时，动物园内展出的珍稀野生动物已达200种

近千只。

正式定名后，动物园事业兴旺发达。

北京动物园正式命名之际，正值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处于蓬勃向上之时。顺应全国的大好形势，北京动物园也大规模地实施建设。如在这一阶段建成的狮虎山、长颈鹿馆、熊猫馆、犀牛馆（今貊馆）、河马馆、羚羊馆等。此阶段不仅建动物馆舍最多，也是展出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激增的阶段。同时，聘请国内外专家组成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国内外动物园合作交流，科学知识的不断普及，使北京动物园在野生动物的饲养、管理、繁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仅成功地首次饲养、展出了众多不同地域的野生动物，还使它们适应了北京的气候、环境，在北京动物园成功地繁殖成活后代。1955年北京动物园首次人工饲养大熊猫，到1963年就率先实现了大熊猫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繁殖成功。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

“文革”期间，北京动物园也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动物交换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动物种类和数量急遽下降。郭题字的“北京动物园”牌匾被捣毁，正门上部门花部分因有龙的图案被铲平。公园大门不能没有牌匾，不得不在毛泽东的三首诗词中集出5



“文革”时期北京动物园大门



今日北京动物园正门

个字制匾悬挂。自此，北京动物园有了“毛体”的牌匾。这也是今天，人们到北京动物园游览时，从不同的入口进园时，会看到存在两种字体门匾的原因。1987年，正门的门花部分依照照片复原。仔细观看、比较，能发现雕刻技艺大不如前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动物园的各项工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北京动物园已逐步成为野生动物饲养、展览、保护、研究的重要基地。在这里，40余处造型各异、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动物馆舍掩映在碧水绿茵鲜花之间，为野生动物创造了适宜生存的生态环境，成为它们安息生子、繁衍后代的家园。动物园人还在继续不断地探索、改造和创新，适宜不同野生动物生存的环境，为它们创造不是原生态，酷似原生态的生存环境。目前展出的约500种6000余只（不含海洋动物）野生动物，有50%以上的属种为国家I、II级保护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I、III。这些宝贵的野生动物资源，为广大科学爱好者和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了解自然、学习和掌握野生动物知识的良

好场所。科研与科普工作，也取得不少佳绩。1978年，采用人工授精方法繁殖大熊猫成功。1988年，采用人工授精方法繁殖黑颈鹤、白鹤成功。1989年6月，世界上第一只人工饲养下繁殖的朱鹮诞生在北京动物园。这些科研成果均获得国家级奖。

1998年，北京动物园被授予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1999年，又被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2000年，被国家旅游局认定批准为4A级旅游景区。

进入新世纪后，北京动物园又不断吸取、借鉴国内外动物园的先进经验，提出“教育保护并举，安全服务并重”的理念，一方面不断投资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尽量营造动物原生态的生存环境，逐步提高动物的福利；另一方面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逐步完善游客的参观游览环境。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提供四季常绿、三季花香，舒适、清新、优美的休憩场所。

2006年6月，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清农事试验场旧址，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动物园的正门，确是这旧址处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也可以称为北京市地标式的建筑之一。

斗转星移，岁月的流逝，记录了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园门的历史，也见证了京城日新月异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北京动物园的大门，每天都在笑迎着来自国内外五湖四海游客。

斗转星移，岁月的流逝，记录了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园门的历史，也见证了京城日新月异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北京动物园的大门，每天都在笑迎着来自国内外五湖四海游客。

西城的里弄式住宅探寻（上）

□ 白皓

西城是千年古都北京的首善之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是拥有胡同四合院最多的行政区域。胡同和四合院代表着北京城独有的传统城市文明和居住文化，被视为“北京的一张靓丽名片”，也是自古以来华夏民居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晶。迄今为止，人们习惯把老北京城院落式住宅统称为“四合院”，没错，老北京城就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院落构成的，但其中只有一部分院落敞亮、格局讲究、建造精美的宅院才可称为“标准四合院”。大多数的院子，虽然四面都有房屋，但做工较为粗陋，只能称为“四合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常见的三合院、排子房、刀把房、一进院等不规则的居住院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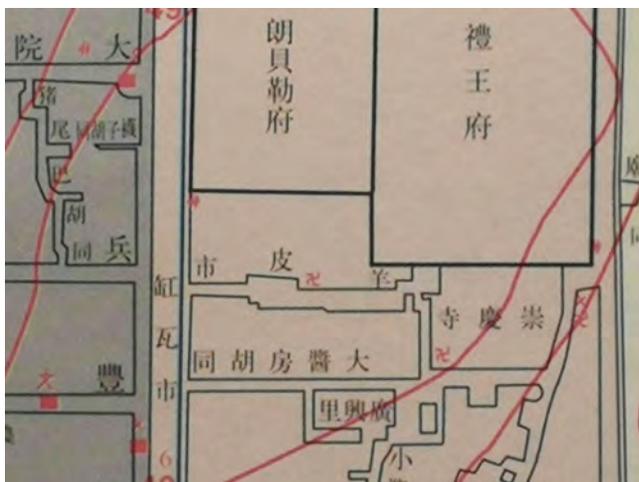
帝王时代，老北京宅院依胡同而建，宅门沿着胡同一字排开，形成了开放型街巷，封闭式院落的格局。院落的正房大都是坐北朝南，这是北方传统民居普遍追求的居住方式。一所宅院由一个家庭或家族拥有，讲究内外有别、长幼有序，这种居住方式是和封建社会的宗法礼制相适应的。民国以前，京城内城主要居住着兵民合一的八旗旗人，汉人和经商的不多。王公贵胄和旗兵统领们占据了胡同里的大部分地盘，他们的管家、差役、家丁及其眷属等也分布在同一胡同或周围，人口成分相对单一。南城主要由汉人居住，还有商人、艺人、教职人员、少数民族、各地来京人员等等。南城和北城的街巷和住宅差别较大，南城的院落（包括各地会馆）相比北城要小得多。

民国以后，京城胡同的格局仍然保留，但居住方式有了很多改变，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以往的里弄式住宅和叫“里”的居住区。翻开民国的北京地图，就能看到：平安里、义达里、崇善里、华康里、泰安里、旌勇里、慎业里、儒福里等很多叫“里”地名。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里弄式

住宅依然保留且仍有人家居住。

“里”，在汉语字典里除‘邻里’、‘故里’的解释外，还有‘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解释。“弄”解释为：‘小巷’，‘弄堂’。由此可见，里弄就是一个有巷子、互为邻里的居住区。我国的里弄式住宅最早出现在上海租界，而后相继出现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民国以前京城没有任何里弄式居住区或叫某某里的地名，也不见有任何文献记载过。最早出现带“里”字地名的是出版于民国五年（1916）的《京都市内外城地图》，这是北洋时期由内务部下属测绘处负责绘制的反映当时京城风貌的一张珍贵详图，图中只标出了一处叫“广兴里”的地名，在缸瓦市大酱坊胡同南侧。市档案馆保存的1919年由京都市政公所要求京师警察厅查明其所辖区域内各街巷新旧名称列表呈报备案中，有贤孝里、南安里、北安里、崇善里、广兴里、安仁里、平康里等地名。最早记载京城带“里”字地名的文献当是上世纪30年代初问世的《燕都丛考》，这是一本全面记述京城历史风物的权威书籍，当中提到了平康里、大森里、贤孝里、厚达里（后达里）、太平里（平安里）这几处都在西城的地名。到解放前夕，北京城区内叫“里”字的地名已有约五六十处。

民国以后，社会开放，流动人口增多，住房需求增加，新潮渐起。里弄式住宅的出现，有了新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出租，俗称“吃瓦片”。一座里弄一般由若干个小院落组成，院子大都非传统式，布局整齐规则，各自院落又相互独立。这样的里弄在临街口处一般都建有讲究的牌楼门，门额上镌刻着“某某里”。里弄有建在原传统居住区胡同里的，也有的建在空旷地区或前朝废弃的功能区域，如：衙署、官房、兵营等地。京城内的里弄式住宅，大都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建造的。也有的“里”



1916年版地图中的广兴里



樱桃斜街安仁里入口处

是建在某个非传统居住区域内，由若干个房主各自建房，经过了较长时间逐渐形成的，整体格局较为零散随意，如厂桥地区的旌勇里、福寿里、五福里等。里弄式住宅，相比传统式院落，能充分利用空间，建造若干个可大可小的院落，独立私密，更受房客青睐。

由于年代久远，这类里弄式住宅大都是私人出资建造，各种文献及方志很少记载，具体沿革和详情已不为世人所知。本人近些年来踏查走访了京城内几十处留存至今和已消失的带“里”字地名的街巷，尽力挖掘一些知情人的口碑，并参阅了大量清末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和地图，力图对这些老北京人曾经耳熟能详、却又逐渐湮没的历史遗迹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此谨撰拙文，以期抛砖引玉，请来方家补正。

最早出现的“里”字地名

广兴里是最早出现在京城地图上的一处地名，它位于大酱坊胡同南侧，由一条从胡同里向南延伸约30米的巷子再向东折弯，形成一个宽一点的夹道。夹道像一个口袋，南北两侧各有两个院子，院门相互对齐，排列整齐。南边的院子都是相同的一进院，四面有房，每个院占地约200多平米；北边的两所院子进深较大，原先都应是两进院。所有的建筑外观还是传统式院落，但都聚集在胡同里的这处

隐秘的地段，和胡同里一字排开的院落明显不同。民国之后，也开始时兴在一块地上分别建几所独立的院子，可以自住，也可以出租。解放前，国民党平津地区军政要员许惠东曾住在这里。解放初，这里作为敌产被军管会没收，后归市委机关，一度成为干部宿舍。这地方的总体格局目前仍然保留，四个院落门牌号是大酱坊胡同18—24号，还有不少人家居住，几乎都成了大杂院。至于它的来历，住户们也不清楚。有位老哥告诉我，原户主的后代2003年左右从国外回来还特地来此看过。

安仁里位于城南樱桃斜街里路北，在小安澜营头条和二条之间，由一条20米长仅1米宽的窄巷子向里延伸至尽头处的两个院门，每所院子都不大，占地都不到200平方米。安仁里仅比广兴里稍晚一些出现，虽然在1919年版地图上没标出地名，却有这处死巷的位置。在1919年京都市政公所的新旧地名列表中已有安仁里。它是我所见过的京城里最小的一个里弄，听老住户说，这里解放前也是两个院子，一个住着唱戏的；另一个住的是做买卖的。直到1965年，安仁里被并入樱桃斜街，目前的门牌是77号和79号。

广兴里和安仁里，一个在内城，一个在外城，格局相似，都是在老胡同里开发的新式居所，院子仍是传统样式，还不是真正的里弄式格局。那时的房主主要在老胡同里建宅，不大可能一次购进很

大的地块。虽然仅有区区几个院子，为何称之为“里”？除非原房主这样起名，或许是这种居住方式有些另类吧。

前朝旧址内的新式住宅

西单地区的崇善里、北安里在1917年版的老北京地图上就出现了，南安里要稍晚一点。这个地方以前叫小东岳庙和前、后王爷庙，不是传统居住区，比较空旷。清朝谢幕，禁律废弛，前朝旧地便开始被开发和利用。由于这里是城中心，交通便利，距离北洋政府六部和各衙门仅咫尺之遥，自然成为房地产商们的垂涎之地。当时，从各地北上来京谋职的官职人员、商旅过客等都成了这里的常客。崇善里、北安里和南安里建成后，这里就形成了三条新的胡同，建筑虽然还是传统院落式居住格局，每所院子都不大，但整体布局规整，外观新颖。这三条胡同目前仍然保留，几乎都成了大杂院，与原貌相去甚远。

在崇善里北侧不远处、府右街以西西皇城根的内侧，在2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了后达里、兴平里、朝阳里、和钟山里（中山里）。这块地原属皇城大内，地势低洼，有前朝废弃的光明殿、惜薪司、兔儿山（图样山）、达子营、盔头作等旧址。和崇善里、南安里、北安里类似，在这里开发房地产必然有利可图。自上世纪一十年代末开始，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居住区，出现了很多条新的胡同。厚达里（后达里）是这里出现最早的“里”字地名，在《燕都丛考》里被提及。从建筑形制来看，后达里和兴平里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居住区，院落多样且不规则；而朝阳里和钟山里（中山里）应是特意开发的居住区，规模不大，院落沿着巷子排列规整，格局鲜明。朝阳里因地处原图样山南侧的朝阳洞而得名，兴平里后来又改称兴平巷。1965年，朝阳里、中山里被并入后达里，兴平巷并入互助巷。这片居住区自2007年后，逐渐被拆除，成为中央机关用地。

厂桥路北在清代有东官房、中官房和西官房，



西单北安里

“官房”原先就叫“关防”，是屯兵的营地。民国以后，便不断有人在这些前朝废址上置地兴业。20年代末的京城详图中，在原中官房和西官房位置上出现了福寿里、旌勇里和五福里这三处新地名。在这片新居住区的旁边，有新成立的辅仁大学和女子职业学校，当时有很多在这两所学校任教和求学的师生就租住在这里。与此同时，在五福里的南侧马路对面还出现了一处永祥里，是在原先皇城内废弃的后库旧址上兴建的，由一片小院落组成，直到2008年后被拆除，建成北大医院新门诊楼。福寿里、旌勇里和五福里大都是在20年代开发兴建的，皆由各式院落组成，且一直延续至今，但已非昔日原貌。旌勇里是因此地原有一座旌勇祠而得名，原



兴隆里（帝王庙东夹道）

福寿里现已成为东福寿里和西福寿里两条街。

西四历代帝王庙东侧早先有一块空场，之前这里曾有一座庙宇，而后逐渐荒废。大约在20年代，这里建成一片聚居区，名为兴隆里。这是在帝王庙东墙外向东约30米后再向北折弯的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建有三合式小院落，每个院子都有随墙小门楼，一共十几座。据这里的一位老住户讲，该房主除此地外，还在东侧的现六合胡同建有六合大院等房产。这些房产在解放前后已大部分售出。兴隆里建成后，它与帝王庙之间形成一个狭长的夹道，俗称帝王庙东夹道。直到1965年整顿街巷地名，这条夹道就改称为大兴隆胡同。兴隆里南侧以前曾为仓库，后成为一座工厂，2005年后将金融街原孟端胡同45号卓公府（果郡王府）移建到这里，同时还拆除了兴隆里最南侧四个门牌的院落。兴隆里目前拥有的门牌是大兴隆胡同9—18号。

新市区里的洋里弄

民国初始，由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铃督办成立京都市政公所，专司京都地区市政建设。为振兴当时京城的工商旅游业，京都市政公所制定了在城南香厂地区建设新市区的方案。这一区域位于珠市口西大街以南、先农坛以北，地势空旷低洼，只有少数棚户和作坊。自1914年开始筹划至1918年，在该区域借鉴上海租界模式，先后拓展修建了香厂、



华康里

万明、保吉、华严、仁寿、仁民、香仁、永安等14条道路，形成南抵先农坛，北至虎坊桥大街，西达虎坊路，东尽留学路的整齐划一的街区，占地约22公顷。

新市区的建筑，市政公所采取了投标招租的办法，要求建筑样式不仅时尚美观，而且要注重质量，强调整体协调。由于地价优惠，市政管理及设施完备，承租者异常踊跃。几年间，这里就建成了以新世界商场中心的一道新景观。那时有报刊描绘新市区：“……两旁各类商店饭庄林立，多为新建筑，兴隆繁盛，游人如织，北京之新气象……”。新市区与“八大胡同”仅一街之隔，而此前的留学路一带就娼妓繁盛，在此背景下，平康里（华康里）、大森里、大安里（泰安里）等新式里弄建筑也随之应时而生。

《燕都丛考》里提到了平康里和大森里，有云：“平康里，开辟不久，原容纳三等妓女而设，初时尚有几家，生意极不畅旺，未几星散。现多为乐户人家及附属者僦居……大森里、平康里艳帜早撤，无复游人踪迹……”，描绘了它们的兴衰。

华康里最初叫平康里，在华严路路北，因其西侧原先有一座平康诊疗所而得名，它是新市区里最早建成的里弄式建筑，大约在1916年底建成。平康里占地南北60余米，东西约40米，临街是一座造型典雅、五开间的二层小楼，墙体厚实。小楼一层正中是个通向里弄内部的石拱形门洞，门洞上方青砖砌就的方形匾额上镌刻着墨书“华康里”，清晰夺目。门洞对面北墙有一座雕花影壁，穿过门洞是一条3米宽的过道，两侧是青砖灰瓦的排子房，各有十排，每排六间房，有背靠背的勾连搭式房屋。这样的建筑格局颇有几分弄堂的味道。华康里前不久完成了居民腾退拆违，目前亟待大修，恢复原貌。

大森里在华康里南侧不远，位于香厂路路南，外形为两栋灰色二层楼房，分成东、西两部分，比华康里稍晚一点建成，最初同为妓院。据近年市档案馆编著《20世纪40年代末北京内外城户籍档案选录》记载，在40年代末曾有王子兰、于佩林、张景仁、杜茂樵、萧品卿、刘庆云等十几位梨园曲艺界



泰安里外景



泰安里内景

演艺人士在这里居住。大森里在解放后改建为农机部招待所和居民楼。由于年代久远，具体沿革已鲜为人知了。

泰安里较华康里和大森里建成的略晚，坐落在大森里东侧，原名叫大安里，后经改建后终成目前的规模。泰安里仿照上海石库门里弄式结构，由六幢外形相近、各有独立天井小院的单体楼房组成，砖木结构，整体建筑占据一个街角，呈L形。六幢建筑由中间一条小巷分成两排，有过街廊道相互连接，六个门洞两两相对通向小巷。内部空间紧凑私密，造型装修考究；建筑外墙由灰砖砌就，墙面轮廓分明，分布着形状别致的各式窗棂和抹灰窗套，壁柱富有装饰感，每幢建筑顶部都有凸起的老虎窗。整个建筑既保留了中式的含蓄又兼有西洋式格调，在街区里鹤立鸡群。据文献记载，这里最初是高级妓院兼游乐场所，后改为住宅和出租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仍住着80多户人家，两年前已全部腾退，目前正在修缮中。

随平康里、大森里和泰安里建成之后，新市区里在20年代又相继出现了居仁里、福昌里、兴盛里等，都属于院落式平房或排子房，只有居仁里和福昌里延续至今，仍为居民区。兴盛里在60年代改名为大川二巷，房屋也被翻建。

居仁里位于永安路东头路北，地处早年灵佑宫西侧，是一条南北走向、2米宽80米长的巷子，巷子两旁各有十多个院子，院门两两相对，每个院子



居仁里

里都是排子房。这里最初的情况不得而知，但有民国时期的多家报刊曾经有报道：1921年，清末名妓赛金花的最后一任丈夫魏斯灵在上海去世后，她只身携一顾姓女佣回京，赁居香厂居仁里16号一间陋室，门首悬“江西魏寓”四字，她那时生活拮据，经常靠接济或以讲述自己传奇身世收钱维持生活。她晚年疾病缠身，于1936年12月3日病逝于居仁里，终年72岁。原居仁里的北部现已不存，成了一所小学的教学楼。

福昌里位于居仁里东边不远，也在永安路路北，建筑格局和居仁里相似，只是规模很小，巷子较窄，长度只有约30米。据现居此处的一位老居民讲，这里早先有一座斗母宫，因失火被烧毁，成为废址。后随香厂地区的开发，这一带有位侦缉队头目与其合伙人一道出资建造了福昌里，用于房屋出

租。著名天桥双簧艺人“大狗熊”孙宝才曾住在这里。目前，福昌里的建筑外观较从前变化很大，只有一个院落房屋的窗户仍保持老样。

新市区的溢出效应

在新市区不断开发建设的同时，在其南部地区也有了新的定位。与它紧邻的城南屠宰场规划为游艺园，先农坛规划为城南公园。1925年，民国政府出卖先农坛北部的外坛，坛墙拆除后，将大片空地按照“福”“禄”“寿”的吉字顺序，添建了福长街、禄长街、寿长街。由此便引来新一轮的房产开发。几年间，在福长街出现了聚兴里；在禄长街出现了禄长里（一巷、二巷、三巷）；在寿长街先后出现了集贤里、永安里、同义里、平安里等，这些新居住区都由小院落组成并配以窄巷。寿长街一带据说是由一位军阀出资建造，准备作为兵营，建成后军阀已撤出京城，只得转手托人代管租售。目前，只有寿长街一带还保留了一部分旧时残巷，原集贤里的大部分于50年代因建虎坊里而拆除，其余并入寿长街二条；原永安里、同义里在50年代并入寿长街三条；平安里相当于现在的平静里，里弄的格局仍存。

1928年以后民国政府南迁，整个新市区建设停滞，趋于萧条，但在整个新市区及周围，民间房地产开发仍不断延续，在不同时期又先后出现了多处带“里”字的居住区。

王公府邸成为新里弄

平安里是北京人都很熟悉的地方，20年前这里是一条丁字街，建成宽阔的平安大街后从这里向西一直延伸到了西二环的车公庄桥。在1946年以前，这里就叫平安里，但还没有平安里大街。平安里是民国时期在前清庄亲王府旧址上兴建的一处居住区。原庄亲王府很大，纵向从现在平安里大街南侧的太平仓胡同向北一直到大街北侧的群力胡同（原麻状元胡同），横向东起西黄城根向西横跨大半条太平仓胡同，原庄王府西墙外的大片空场以前也属

于庄王府的地界。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义和团运动中，庄王府的主人，铁帽子王载勋串通端郡王载漪并伙同几位大臣，怂恿慈禧太后让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开战，并以其府邸为据点聚集大批义和团团民并设神坛。联军破城攻入京城时，载勋正随慈禧和光绪西逃，作为肇事祸首的庄王府被联军烧毁，众多义和团民也在府内遭屠杀。在列强要求下，作为谈判议和的条件之一，慈禧遂降谕旨，将载勋问罪并处死。

直到20年代初，因财源断绝，庄王府难以为继，府邸主人溥绪将府邸以二十万大洋售与津籍北洋军阀李纯之弟李馨（字桂山）。获得产权后，李家将王府的地上建筑全部拆除，并将府邸的砖石瓦木等材料运往天津，建成了李氏祠堂。随后，李桂山又出资在原府邸旧址上兴建了新式住宅区——平安里。建成后的平安里由几条小巷分割成几个区域，靠近西部是八九座小洋楼；中、东部分区建成了不同档次的院落群，整个房产用于租售，成为市内规模最大的叫“里”的居住区。抗战胜利后，为便利交通，北平市政当局决定将地安门西大街与西四北大街之间打通，修建道路从平安里中部穿过，这条路就是日后的平安里大街（地安门西大街最西段）。解放后，平安里成为军队机关和干部宿舍，平房先被拆除建楼，剩余的几座洋楼90年代初在路南、路北的院子里还能看到。在80年代末还能看到由李桂山题写的“平安里”砖刻门额一方，被嵌在太平仓胡同东头路北的院墙上。随着机关大楼的兴建和平安大街的扩建，原平安里的所有遗物于90年代末几乎被拆尽。现太平仓胡同原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处院里还有一座洋楼，它应是末代蒙古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于20年代在平安里买下的一座洋楼，作为在京的府邸。这座洋楼曾于30年代被帕王长子岷吉多尔吉转卖给比利时教会掌管的博爱堂（负责绥远等西北郊区）。

位于缸瓦市路东的义达里，很多老北京人也很熟悉，它临街是一座20多米长的旧式牌楼形建筑，牌楼房用作铺面经营生意。牌楼门是进出义达里的



义达里外景

唯一通道，是一座拱形门洞，上方山墙门额上镌刻着由军阀张作霖幕僚张济新题写的“义达里”，字迹醒目。义达里前身是前清定亲王府，府主贝勒毓朗是乾隆长子永璜后代，晚清重臣，曾任军机大臣，末代皇后婉容是他的外孙女。清帝退位后俸禄断绝，毓朗之子贝子恒醇于1928年开始变卖府邸。一位经营油料生意的韩姓天津商人买下了大部分府址，即府址西部偏北，包括花园在内建筑较为稀疏的地段。这位韩姓商人有军界要人为背景，由他出资并委托其亲属监管，于1936年建成了这所新式社区。

义达里内除主通道外，有六条巷子，分别是：乐群巷、贤孝巷、慈祥巷、福德巷、忠信巷和勤俭巷。乐群巷较宽，建在最西边；其余五条巷子都建在东边，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每条巷子内有并排的几所院落。每条巷子内是一排传统式小院落，格局相同。每条巷子之间的院落都有差别。主通道一侧建有几所较大的中西合璧的院落。整个社区一共建成36所院子，有10所较大，为两进院。当时所有院落都通上下水，有锅炉房集中提供暖气和热水，房屋地面用西式地砖铺就，卫生间里都配有浴缸。义达里在日伪时期被不少日本人占据，解放前有几



义达里内景

个门头沟的煤老板在此租住。解放后，房主将义达里的大部分房产交给了国家，成为单位和房管所共有的居民区。文革后，这里又添建了很多临时性房屋，原有的规整格局大为改变。

就在同一时期，在定亲王府南侧的一块地也被开发，建成了一处叫吉祥里的居住区。吉祥里由临街的小窄巷为入口，里面只有四个传统式小院落，全建在巷子南侧。吉祥里在60年代并入西四南大街，目前门牌是166号至172号。

二龙路地区原先有个二龙坑，在郑王府的西侧，地势较为空旷。20年代起，这一带陆续建成了几所大、中学校，如：中国大学（大木仓郑王府）、北平艺专（中京畿道）、师大女附中（辟才胡同）、志成中学（原二龙坑）等。在此执教和求学师生多半是外地人，学校不管住宿，于是这一带住房和租房需求旺盛，房产开发应时而生。原郑亲王府西侧王爷佛堂的后身，以前是一片低洼地。郑王府败落后，将这片空地出售。大约在20年代初始，有人在这里筑宅置产，形成了一条曲折的巷子，巷子两边都是各式的院落，起名为高华里。有记载，1923年齐白石从三道栅栏迁居这里，三年后又搬到北侧不远的跨车胡同自置的新家。民国早期，有不少政府职员租住在这里；日伪时期，有日军军官占据了这里的几个院子。解放前，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女士也住过这里，当时年少的王光美就在志成女中读书。董女士生前热衷慈善事业，在解放前夕创办了洁如幼儿园，专门接收刚进京的解放军的婴幼儿。解放后，高华里的大部分房屋成为政府机关宿舍，十几年前被拆除建楼。

贤孝里在西绒线胡同路北，以前是成公府（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后裔府邸）东侧的夹道，原是一条经道。民国初，府主将府邸东侧马圈的一块空场出售，建成了一片传统院落式居住区，起名为贤孝里。（未完待续）

强化档案服务能力，切实将资政惠民落实处

西城区档案局始终把服务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档案利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半年共接待查档利用者6264人次，提供利用档案4954卷（件），复制扫描馆藏档案317页，开具证明5099份，利用数字化档案7830件。充分发挥代管职责，为区委统战部、区政务办、区纪委等部门提供业务档案查阅服务。

区档案馆近年来抗战专题编研成果显著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重要指示精神，近年来，西城区档案馆以主办刊物《西城追忆》作为平台，将收集的大量反映西城区域内抗日战争题材的文章和图片在刊物上发表，通过档案史料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重现全民族英勇抗战的历史画面，从另一个维度体现档案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价值和意义。

区档案局加强档案库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自今年8月以来，西城区档案局联合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档案库房的硬件设施，进一步加强档案库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包括对库房墙体的粉刷工作、库房的灯管更换工作、库房的清洁工作等。经过一系列完善、改造和维护库房硬件设施的工作，档案库房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进一步保证了档案实体的安全。

西城区档案局召开档案行政执法监督会

8月3日，区档案局召开了西城区档案行政执法监督会。此次会议意在督促各立档单位尽快完成2017年度归档工作，保证本单位的档案实体与信息安全。会上通报了2017年度我区档案归档整体情况，总结了参会单位在档案整理过程中存在档案收集不够齐全，档案归档范围及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规范等突出问题。各参会单位就本单位2017年度档案归档工作进展情况、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汇报。

区档案馆积极发挥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西城区档案馆与区史志办联合推出“以档为证 以史为鉴”档案史料展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该展览通过大量档案资料展示了西城区改革开放40年的奋斗历程及辉煌成就。展览可在“西城档案”线上浏览，同时在区政务服务办、区第一图书馆等地巡回展出。自布展以来，先后接待了中国社会艺术学会、海关总署、市审计局、市档案局、区统计局等众多单位，极大地发挥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

实施双随机检查，促进档案工作

7至8月，区档案局机关文档科与法制科，联合区政府法制办，分别对区委区政府研究室、区委政法委实施档案双随机检查。检查组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对两个单位档案管理制度建设、档案实体整理以及各门类档案集中、统一、安全保管情况均做了细致的审阅和检查。对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各门类的归档工作，检查小组提出了具体化、专业性的建议，并将双随机检查结果汇总后及时反馈给了相关部门，为提升西城区政府各部门今后的归档工作起到了极大的监督和推进的作用。

档案编研资料助力古建旧貌恢复工作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关服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通过查阅西城区档案局出版的档案编研资料《西长安街记忆》《西交民巷地区文史图集》，最终查实了银行街西交民巷27号院历史图片资料，为农行配合北京市完成破除拆墙打洞、恢复历史建筑旧貌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充分发挥了档案编研资料的“资政”作用。

区档案馆加强汛期内库房险情排查力度

为应对北京汛期连续强降雨现象对我馆库房可能造成的影响，西城区档案馆加强汛期内库房险情排查力度，每日上、下午各检查档案库房一次，高度关注库房部分墙皮脱落现象并认真做好记录，防止出现危害档案实体安全的情况发生。

我局相关业务科室前往海淀区档案馆参观交流

8月28日，西城区档案局李勇副局长率领管理科、利用科、文档科相关工作人员一行12人，赴海淀区档案馆交流工作。双方就电子档案归档、系统升级、库房管理及档案数字化等业务工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此次学习，大家拓展了工作思路，对今后的业务的开展将有很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服务区域发展 展示文化积淀

西城区档案局建立“西城档案”微信公众号一年多来，利用新媒体传播档案文化，已发布原创图文160篇，阅读总数达46940次，阅读人数21705人。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内容始终以档案为中心，突出区域特色，深入挖掘档案背后的故事，与民生关注的要点相吻合，使档案文化成为人们看得见的“乡愁”，触发粉丝共鸣，以积极、健康、向上的形象宣传西城档案工作和档案文化。

依托信息化资源 打通服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

为推进全市民生档案信息资源联网，将档案“服务于民、利用于民”的宗旨贯彻始终，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到实处。区档案局高度重视民生档案跨馆利用工作，明确主责科室，明确上报目录数据字段格式和数字化副本存储结构要求，制定《婚姻档案跨馆利用工作准备方案》，及时向市局移交数据 658055件。组织研究南北两馆电子数据整合、资源共享工作，并初步制订《西城区档案馆档案管理系统合库方案》。

档案文化进四中

为了让中学生进一步了解北京的文化底蕴，丰富他们的历史知识，西城区档案局的“档案记忆西城”系列工程走进校园，开展影像档案文化专题公益讲座。9月10日，区档案局邀请历史影像研究者徐家宁先生来到北京四中的高二人文班，向学生作了90分钟的“寻踪北京城：从阜成门到朝阳门的风景和历史”影像课。

区人大退休老干部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

近日，西城区人大组织退休老干部参观了由西城区档案局主办的《以档为证 以史为鉴——西城区纪念改革40周年档案史料展》。作为西城区改革开放历程的决策者、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老干部们通过参观近距离地感受到我区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重大成就、丰硕成果，更深刻地体会到西城区所展现的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

西单商业区改革开放40年史料展开幕

2018西单时尚节期间，区档案局、区商务委和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合作举办的主题展览《纪录成长 展示芳华——西单商业区改革开放40年史料展》已于近期正式对外开放。作为2018西单时尚节主要活动之一的展览，将在位于西单商场五层的西单商业博物馆内持续摆放一个月。参观者不仅可以了解到西单商业区的前世今生，更能深度解读西单40年的发展轨迹。

防患于未“燃”，区档案馆举行消防安全系列活动

为深刻汲取巴西博物馆火灾教训，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西城区档案馆高度重视档案库房安全工作，举行消防安全系列活动。9月27日，区档案馆全体人员参加2018年度消防知识培训，由消防安全专家为全体干部普及了防火、灭火、逃生、自救四方面的安全知识，提升了档案干部的防火意识。9月28日，又在南北两馆分场地同时开展2018年度消防应急演练。通过此次演练，区档案馆全体干部的消防安全常识进一步丰富，熟悉和掌握了各种消防器材准确的使用方法，自身面对灾情的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和应急应变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极大提升了实战演练的技能和水平。